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區域研究之下的南亞視野－從美國學院體制中南亞研究的發展與困境談起

Area Studie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 South Asia:  
The Evolution and Challenges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n American  
Academy

doi:10.30390/ISC.200803\_47(1).0004

問題與研究, 47(1), 2008

Issues & Studies, 47(1), 2008

作者/Author：張世澤(Shih-Tse Chang);張世強(Shih-Chiang Chang)

頁數/Page：87-12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803\\_47\(1\).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803_47(1).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區域研究之下的南亞視野— 從美國學院體制中南亞研究的發展與 困境談起

張世澤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觀光與餐飲旅館系專任助理教授)

張世強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代南亞研究開始現身於美國學界，儘管其受到區域研究跨學科典範的影響，但卻仍未能完全擺脫東方學和印度學所積累下來的濃厚古典主義色彩，並在幾所領銜區域研究的重點大學院校中，形成獨樹一格的南亞研究傳統，著重於非功利取向的人文式理解；唯在受到一系列知識性與制度性的質疑和挑戰之後，隨著區域研究本身面臨學科紀律的重組與反省，過去對於南亞問題的研究視野，也開始出現許多檢討與轉變。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們便將透過南亞研究在美國學界發展軌跡的回顧與檢討，描繪區域研究之下南亞問題的特殊討論方式，以及其所面臨的各種困境，進而指出未來南亞研究的可能發展方向，俾供尚在起步中的台灣南亞研究參考。

**關鍵詞：**印度學、全球化、南亞研究、區域研究

\* \* \*

## 壹、前言

儘管西方知識界對於非西方世界理解的嘗試，可以上溯至歐洲帝國主義擴張之始，但嚴格意義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一詞，則主要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意指一種以美國學界領銜的知識活動。著名的漢學家與中國問題研究者史華慈(B. Schwartz)便曾指出，區域研究體現出一種西方理解非西方的嘗試與努力，企圖透過

「壓縮式的理解」(encapsulated understanding) 迅速掌握非西方世界的現況。①爲了突破過去侷限於歐洲大陸的世界觀，因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局勢，一種結合國家資源、私人基金與學院體制的「美國式區域研究」(American style of area studies)，開始在美國學院體制中取得顯著位置，進而積極帶動一種「美國式全球化」(American globalization) 風潮。②安帕杜萊 (A. Appadurai) 也同樣認爲，區域研究是「過去五十年間美國學院對於世界進行的大規模制度性認識活動。」③

區域研究是一個概括性詞彙，④指涉一系列具有共同信念與特質的學術領域活動，並根據其研究對象所身處的相對位置來加以定義。⑤在區域研究所展現出來的共同特徵中 (像是重視語言訓練、田野調查、地方資料與觀點)，「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 或「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 特徵則是其中最引人矚目之處。詹頓 (D. L. Szanton) 認爲，這種「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特質非常重要，因爲沒有任何單一學科可以概括區域現象全貌，而透過這種整合途徑嘗試認識、分析、詮釋異文化與社會，也有助於外部研究者自我省察，批判「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的世界觀；⑥儘管區域研究從一開始，便具有濃厚的現實關懷，以及政治、經濟和戰略取向 (此亦爲區域研究備受批評之處，詳見後文討論)，然而透過對於多樣性的認識，並以創新方式跨越傳統學科邊界，區域研究不僅讓美國更瞭解世界，也讓其霸權和中心的位置受到衝擊，並促使既有分科的大理論和假定必須重新檢討。

然而區域研究雖然深具貢獻，但在其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卻不斷在制度上、資

註①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98.

註② 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

註③ Arjun Appadurai,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in Arjun Appadurai, ed., *Globaliz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

註④ 儘管有論者批評「區域研究」這個詞彙太過模糊，但史華慈卻認爲，這個詞彙正好可以用包含區域研究本身的跨學科特性。因爲如果使用「非西方文化研究」(study of non-western cultures)，很容易讓人以爲區域研究者和人類學家一樣是在研究「文化」問題，並使用人類學的學科紀律來看待區域研究；但如果我們使用「非西方社會研究」(study of non-western Societies)，也很容易讓人以爲區域研究者和社會學家一樣是在研究「社會」問題，並且使用社會學的學科紀律來看待區域研究；參見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 99.

註⑤ 史華慈對於「區域研究」的界定，將作爲下文討論和理解「區域研究」內涵時的重要參照：「……『區域』一詞，就字面意思而言，乃是意指地表上的某個人類集體居住部分，由於這些人們在不同的生活領域中，形成一個相對自主的互動領域，而使得她們能夠相對區隔於其它人類集體居住部分。因此，可以說，區域是一個研究集體經驗的跨學科領域，研究者企圖辨析其中經濟、社會、政治、宗教和其它生活領域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參見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p. 98-99.

註⑥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rticle 1, 2003,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

源上與知識上（甚至是在政治上）面臨嚴峻的挑戰與考驗。從區域研究與傳統分科（disciplines）之間的角力與辯論開始，再到「東方主義」（Orientalism）與「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興起之後側重於「知識與權力」關係的批判，直到冷戰終結與全球化時代之下的各種環境變遷考驗，都在在使得區域研究必須不斷檢視自身的屬性與定位，隨時調整步伐。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區域研究中一個重要分支的「南亞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自然同樣必須面對上述區域研究的共同挑戰與困境，並提出自身的解決方案。

西方知識界對於南亞的探究，亦非始於區域研究出現之際，事實上，在殖民統治與傳教動機驅使之下，早從 18 世紀開始，歐陸知識界便已經積累了一系列可觀的「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論述與知識傳統，<sup>⑦</sup>並為日後歐陸「印度學」（Indology）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sup>⑧</sup>但戰後於美國學界熱烈開展的區域研究，卻提供另一種理解南亞的重要途徑，並儼然成為一股極具主宰地位的知識觀點，迄今仍然深刻影響我們對於南亞的理解；<sup>⑨</sup>然而這種置身於區域研究典範之下的南亞視野，究竟將如何呈現南亞問題的形貌，並形塑我們對於南亞的理解？作為一門區域研究重要分支的「南亞研究」，又將如何回應上述區域研究面臨的共同困境與挑戰？此外，相較於其它區域研究領

---

註⑦ 「東方學」的建構乃是伴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而來。正因如此，這種關於「東方」論述與知識傳統，也往往流露出濃厚的西方中心和優越意識，並刻板化東西方之間的界分，而這也是「東方主義」者極力撻伐的對象（詳見後文討論）；然而從 18 世紀末期到 19 世紀初期，我們卻可以看到另一種「美化」（Indomania）東方（印度次大陸）的知識發展傾向。配合著殖民者強烈的「尋奇」心理和「語言文獻學」的發展，許多論者開始將印度次大陸視為靈性導師、世界文明的搖籃，可以協助重新認識西方文明；但這種過度「美化」的知識傾向，在後來也激起另一種結合恐懼與歧視心理的「貶抑」（Indophobia）知識傾向。無論是「美化」或「貶抑」，都充分體現彼時西方對於未知「它者」的想像特徵：Thomas R.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chapter. 4；黃柏棋，*宗教秩序與政治秩序：論印度思想及其與不同傳統之交涉*（台北：明目，2005 年），頁 1~3。

註⑧ 「印度學」意指對於印度次大陸歷史、語言和文化的學術性研究；「印度學」也被稱作「印度語研究」（Indic studies）或「印度研究」（Indian studies）。「印度學」是一種對於印度語系事物的綜合性知識追求，特別著重對於過去的詮釋；許多學者更將「印度學」區分為「古典印度學」（classical Indology）與「現代印度學」（modern Indology），前者著重於梵文和其它古老語言的根源；後者則致力於現代南亞語言和社會的考察。「印度學」一詞與德國學界關係密切，也是歐陸大學一個常見的學術分科，但卻較少見於英美語系；儘管稱呼各異，但「印度學」通常不以當代南亞經濟和政治作為主要研究重點，除非這些議題牽涉到南亞歷史與文化層面，而具有「印度學」考察的重要性；「印度學學者」（Indologist）經常透過精通多種南亞語言以獲得知識，像是梵文、巴利文、泰米爾文、波斯文、方言，而這也成為此一領域研究者的重要特色；「印度學」研究領域經常與許多其它分科產生關聯，因此研究者經常將其它學科（例如：文化人類學、哲學或宗教研究等等）的觀點綜合運用在自身的討論主題之上。

註⑨ 美國學界中的辯論，儘管也可見於其它國家，但卻並非如此活躍，巴黎與倫敦也擁有許多全球各地的知識份子，許多歐洲大學也有類似的研究中心和課程，但她們大多數聚焦其殖民或前殖民領地。同樣，日本與澳洲大學也有關於臨邦東亞和東南亞的研究，但卻比較不關心較遠的地區，只有美國設有全面性針對不同地區的研究中心和課程。

域，「南亞研究」所具有的特殊知識傳統與制度發展處境，又將如何影響其對於南亞問題的理解？

透過回顧與檢視「南亞研究」在美國學院體制中的發展過程，本文嘗試針對上述問題從事進一步地探究，思考未來「南亞研究」的可能發展方向，從而援引作為未來台灣「南亞研究」開展的經驗參考。基此，在本文以下的討論中，本文將分成五個部分進行討論。首先，本文將先從區域研究開展的基本背景描繪開始，說明「南亞研究」早期發展的概況，以及「印度學」知識傳統對於其研究視野的特殊影響；其次，本文將進一步論析「南亞研究」在其制度上與知識上所遭遇的各種挑戰與困境，說明後殖民批判與特殊學院生態如何影響「南亞研究」發展。再者，透過聚焦討論後冷戰與全球化時代對於整體區域研究的深刻衝擊，以及南亞研究如何因應此種發展趨勢，本文將嘗試反省未來「南亞研究」的可能發展方向；然後，透過美國學院經驗的綜整與借鏡，本文將把目光聚焦未來台灣「南亞研究」的發展願景，針對幾個關乎其研究前提的重要問題，提出若干省思與建議，希冀引起更多的關注與重視；最後，在結論部分，本文則將在現況條件基礎之上，嘗試針對未來台灣「南亞研究」分期發展階段，提供一個可能的藍圖規劃，期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從而藉此進一步凝聚並整合現今台灣散佈各分科領域內關注南亞問題的研究者。

## 貳、興起於冷戰局勢之下的南亞研究

嚴格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除了像是歐洲歷史、文學或比較宗教等等這類課程之外，美國學界對於非西方世界的涉獵其實非常狹隘，而絕大部分關於非西方社會的專家，也偏重於非當代議題的考察。環顧彼時美國學界對於南亞的研究，也正係植基於上述歐陸「印度學」知識傳統，並深受「語言文獻學」(philology)影響。<sup>⑩</sup>歐陸知識界對於印度宗教和語言的關懷，也逐漸地吸引一群美國東方學者投以目光。1844年耶魯(Yale)大學率先開設梵文課程；隨後，哈佛(Harvard)大學與約翰霍普

註⑩ 由於當時普遍認為掌握語言乃是窺探種族與文明發展的關鍵，因此「語言文獻學」也被視作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知識，甚至被宗教學始祖穆勒(Max Müller, 1823-1900)認為是一種自然科學；參見 R. Inden, *Imagining India* (Oxford and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0), pp. 12~20；至於梵文，自從英國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提出其關於「印歐語系」的理論之後，便被認為與其它重要歐洲語言系出同門，在宗教和社會生活上扮演重要角色，成為探索南亞(印度)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解關鍵；參見 Vinay Dharwadker, "Orientalism and the Study of Indian Literatures," in Carol A. 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 eds.,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3), pp. 158~185；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語言文獻學」在歐陸(以德國為首)的發展達到高峰，而其也成為「印度學」的研究主流；關於早期歐陸「印度學」發展和「語言文獻學」之間密切聯繫的進一步討論，可以參見 Douglas T. McGetchin, Peter K. J. Park and Damodar Sar Desai, eds., *Sanskrit and Orientalism: Indology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Germany, 1750-1958* (New Delhi: Manohar, 2004)。

金斯 (Johns Hopkins) 大學則分別於 1869 年跟進；1892 年芝加哥 (Chicago) 大學成立時，則設立「印歐比較語言文獻學系」(Department of Indo-European Comparative Philology)，引入歐陸「印度學研究」(Indological Studies)；<sup>⑩</sup> 1900 年七所美國知名大學進而共同成立一個「梵文俱樂部」(Sanskrit Club)，成員包括：耶魯、芝加哥、哈佛、賓州 (Pennsylvania) <sup>⑪</sup>、哥倫比亞 (Columbia)、加州 (California) 等知名學府；其後數年間，這些知名學府也相繼開設相關梵文課程。<sup>⑫</sup>

整體而言，由於梵文與南亞宗教與社會的密切聯繫，加上受到前述「印度學」結合「語言文獻學」傳統的影響，使得早期焦點多擺在古典語言之上，並不關注當代南亞現況發展，也不強調現代語言和文化議題（除了少數計畫前往印度傳教的訓練課程之外）。同時也使得在美國極有限的梵文課程中，多傾向從宗教或比較研究（特別是比較於基猶宗教傳統）架構切入，<sup>⑬</sup>而這種側重語言的基本態度，無疑也影響了日後南亞研究的基本方向；<sup>⑭</sup>儘管已經有著某種程度的發展，然而積極的南亞研究卻還是得益於戰爭的推動。

事實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便已經有一群拉丁美洲和蘇聯學者開始鼓勵研究合作，但一直到戰爭爆發之後，美國華府才開始積極網羅區域問題專家負責分析情報，協助訓練海外工作幹部與戰後佔領工作。對於日後南亞研究發展具有舉足輕重角色的賓大教授布朗 (W. N. Brown, 1922-1975)，也是其中一位曾在戰時服務於華府的區域問題專家。戰爭末期，布朗便已經開始大力呼籲美國知識界必須正視全面認識世界各大文明區域的重要性。戰爭結束之後，儘管美國積極透過「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重建歐洲秩序，但此時歐洲卻似乎不再是全部關注的焦點，因為美國開始驚覺自己對於其它地區的嚴重忽視，無論是自由或保守主義菁英，都深感蘇聯、中國、冷戰及第三世界的威脅與日遽增，而她們卻缺乏回應這種世界局勢的基本能力。

儘管迄今許多論者仍然認為，戰後美國區域研究的發軔乃源自蘇聯於 1957 年率先

註⑩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South Asia at Chicago: Fifty Years of Scholarship," n.d., <<http://www.lib.uchicago.edu/e/su/southasia/50yrs1.html>>

註⑪ 對於日後美國南亞研究具有重要影響的布朗（詳見後文討論），也從 1926 年開始於賓大教授梵文課程，並協同多位近東專家於 1931 年創立「東方研究系」(Oriental Studies Department)，其中有些討論主題也得到「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簡稱 ACLS)（該非營利組織成立於 1919 年，旨在促進並獎勵人文學科與相關社會科學中的人文研究，加強學術團體間交流）的大力贊助；參見 Rosane Rocher, "W. Norman Brown, 1892-197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96, No. 1 (1976), p. 5.

註⑫ Richard Davis, *South Asia at Chicago: A History* (Chicago: Committee on Southern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p. 3.

註⑬ Robert P. Goldman, "Sanskrit,"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Delhi: Manohar and AHS, 1998), pp. 501-517.

註⑭ Alyssa Ayres, "Beyond Disciplines: Indi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Review*, Vol. 5, No. 1 (2006), pp. 16-18.

發射史波尼克人造衛星 (Sputnik) 事件的刺激，以及其在美國輿論界所造成的恐慌，讓美國擔心在科學、技術、外語上落後蘇聯 (詳見後述)，但其實該事件只能說是促使美國官方正式介入區域研究的開端，因為早在該事件發生前數年，由私人基金會大力贊助的區域研究便早已悄然展開。福特 (Ford)、洛克斐勒 (Rockefeller) 和卡內基 (Carnegie) 三大民間基金會，戰後便曾經召開一系列會議，並獲致共識認為：美國必須立刻增加對於其它陌生區域的瞭解，藉以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現代化、民主，維護美國利益；但它們同時指出，若僅單純套用美國政經學者的鉅型理論，則未必能達到此一目的，因為各個區域情況差異甚大，所以它們必須先從文化和歷史面向著手。也因此，這項計畫不僅需要政經學者，也需要其它社會科學者和人文學者。<sup>⑯</sup>對於三大基金會來說，區域知識的累積目的，不僅在於讓政策分析或外交方針能夠從中獲益，也希望作為菁英教育中的一環，因此大學遂成爲一個重要的媒介。

由於三大基金會的大力贊助，使得區域研究開始在大學中迅速擴張。在這個背景之下，唯一於戰時持續進行梵文教授的賓州大學，<sup>⑰</sup>也成爲戰後第一個開設南亞研究並設置系所的大學。1947 年，該校率先開設一系列暑期研修課程，並在三大基金會的贊助之下，在 1948 年正式成立「南亞地區研究系」(Department of South Asia Regional Studies)。在布朗的領導之下，賓大招募一批戰時曾任職於華府的南亞專家，並於 1949 年開始擁有一個完整的南亞研究學程 (program)，吸收研究生與大學生。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布朗個人獨特學思與經歷的影響，使得賓大南亞研究從一開始便開創出一種結合古典「印度學」和當代議題關懷的研究傳統，並進一步影響美國早期南亞研究的整體發展基調。或許，早年跟隨傳教士父親旅居印度的經驗，以及戰時任職於華府戰略工作的經驗，使得接受古典梵文訓練的布朗，<sup>⑱</sup>其學術關懷不僅跨越了傳統語言文獻學的框架，更進一步結合了對於當代南亞政經議題的重視；<sup>⑲</sup>儘管布朗個人對於南亞宗教、社會、文化的觀察的觀察與評論，似乎仍帶有濃厚的殖民和東方

註⑯ Jackson Janes, *Priming the Pump: The Making of Foreign Area Specialists*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91), pp. 1~5.

註⑰ Alyssa Ayres, "Disconnected Networks: Notes towar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Filling the South Asia Expert Gap," *India Review*, Vol. 2, No. 2 (2003), pp. 70~72.

註⑱ 布朗個人受到古典梵文訓練，在布隆菲爾德 (M. Bloomfield) 指導之下，1916 年取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取得博士學位之前六年，他的傳教士父親，也同樣在布隆菲爾德指導之下，完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學位。父子先後授業布隆菲爾德門下，一時之間，傳爲美談；參見 Rosane Rocher, "W. Norman Brown, 1892-1975," p. 1.

註⑲ 布朗在 1953 年出版的美國、印度與巴基斯坦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nd Pakistan*) 一書中，便充分流露出他深厚的人文素養，以及他對於當代南亞政經發展的關懷，該書扼要說明印度歷史，從印度和文明、英國殖民到印巴分治，提供大量關於當代政經發展與美印巴外交關係的資料，而他對於南亞宗教、歷史與哲學的深厚涵養與涉略，更是流露其中；參見 Rosane Rocher, "W. Norman Brown, 1892-1975," p. 5；然而他對於印度民族主義的同情立場，卻也使得他不僅暗指穆斯林是破壞印度民族主義的潛在力量，也使得他傾向從宗教社群傾軋的角度解釋印巴分治的成因，而這種解釋角度也影響日後西方與印度學者看待印度社會衝突的觀點。

主義色彩，並因此深受今日許多論者批評，但毫無疑問地，透過他在賓大的耕耘和國會的遊說工作，使得南亞研究得以確立其初期發展的模式（在知識上：結合傳統「印度學」與當代議題的研究取向；在制度上：「系所」配合「研究中心」（得益日後聯邦基金資助而成立；詳見後述），並獲得更多學術上的重視與經濟上的奧援，不僅訓練出許多美國南亞研究的第一代成員，<sup>⑩</sup>也吸引許多重點學府加入南亞研究與教學，像是柏克萊、密西根、哥倫比亞、威斯康辛等大學。

在賓大之外，另一個同樣得益於三大基金會資助的早期南亞研究重鎮，則是戰前也略有「印度學」研究基礎的芝大（為了因應戰爭需求，芝大也曾設立速成語言訓練課程）。從 1940 年代後期開始，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之下，著名人類學者雷得菲爾德（R. Redfield）與曾受業於科學哲學大師卡納普（R. Carnap）門下的辛格（M. Singer）二人，便開始運用贊助資金召開一系列研討會，並以「文明研究」為題，<sup>⑪</sup>編撰《文化與文明之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系列叢書，企圖比較和廣泛理解歷史上主要社會的價值系統；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項大型比較文明的計畫中，最早的研究重點並非侷限在南亞之上，但由於受到柏克萊人類學家曼戴爾鮑恩（D. Mandelbaum）（首位於印度進行嚴格學術田野調查工作的美國學者）與斯里尼瓦司（M. N. Srinivas）（提出著名「梵化」（Sanskritization）概念解釋印度社會流動的學者）的雙重影響，<sup>⑫</sup>驅使雷得菲爾德與辛格二人逐漸將此項計畫關注的重點，開始從中國、歐洲、伊斯蘭，轉移到南亞（特別是印度）之上，並著手帶領研究生從事實際田野調查工作；<sup>⑬</sup>到了 1953 年，更是全力轉而投入印度文明的研究。

在雷得菲爾德與辛格二人的努力之下，使得南亞成為日後芝大許多系所特別重視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在此項比較文明計畫的引領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不僅有越來越多學者投入此一領域，同時也開創出一種深具人文關懷傾向的南亞研究典範（有別於其它強調國家實用利益的區域研究典範）。在賓大之外，芝大開創了一種結合

註⑩ 許多日後重要的美國南亞學者，在學生時期都曾經接受賓大課程的洗禮，像是鑽研印度政治並畢業於哈佛大學而任教於柏克萊的政治學者帕克（R. L. Park）（在福特基金會贊助之下，曾於該校創立「現代印度計畫」（Modern India Project）），他後來轉到密西根大學任教，並於 1978 年擔任「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參見 Robert Crane, "Preface on Richard L. Park," in Paul Wallace, ed., *Region and Nation in India*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1985), p. 7.

註⑪ 最早，二人是向卡內基基金會爭取設立「文化研究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Studies）的經費，但卻未能成功，1951 年才終於得到福特基金會贊助此項「比較文明計畫」（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Project）；參見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South Asia at Chicago: Fifty Years of Scholarship," n.d., <<http://www.lib.uchicago.edu/e/su/southasia/50yrs1.html>>

註⑫ Milton Singer, "David Mandelbaum and the Ris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A Reminiscence," in Paul Hockings, ed., *Dimensions of Social Life: Essays in Honor of David G. Mandelbaum* (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1987), pp. 1~9.

註⑬ 他們的田野調查成果最終也被編輯為村落印度：小社群研究（*Village India: Studies in the Little Community*）一書，該書編輯馬里歐特（M. Marriott）在本書出版之後，也從柏克萊轉任芝大，加入雷得菲爾德與辛格二人的行列，並力倡長期經驗性田野調查式的印度研究。



人類學關懷與田野調查方法的研究取向，而受到此種知識傳承的影響，我們也可以看到，相較其它區域研究學科，人類學始終在南亞研究中位居一個非常顯著的角色。<sup>④</sup>同時在這種「田野式人類學」視野之下，對於許多芝大南亞研究學者來說，「南亞」似乎也並非意味著一個政治單元的組合，反而更像是一個需要深刻投入理解的文明對象。

在三大基金會的贊助之下，賓大與芝大開展的模式，代表美國學界早期南亞研究發展的一種重要軌跡，一種非「應用性」研究的發展軌跡，著重於智識上的追求；然而在受到 1957 年蘇聯發射史波尼克人造衛星事件的刺激之後，隨著美國官方涉入區域研究程度的升高，一方面帶動了更為全面和多元的區域研究發展，二方面也加強了區域研究在「應用性」上的需求；事實上，1958 年「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簡稱 NDEA) 的制訂與通過，便可以說是美國區域研究發展的重要一個轉折點，當然這項法案也同樣影響了南亞研究的發展。

在 1958 年「國防教育法案」將大筆「聯邦基金」(federal funds) 注入高等教育機構以前，美國政府其實早已體認到未來士兵與公務員熟悉區域語言的重要性，但其未在政府體制內部設置相關機構，而是在大學內部設立贊助計畫，像是美國軍方在大學中設置「軍方專門訓練課程」(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s)，或「民政訓練學院」(Civil Affairs Training School)，皆為適例；後來的「國防教育法案」也係在此基礎之上加以擴張，一方面繼續補助大學當中的語言訓練課程，二方面補助大學聘用各領域南亞專才，三方面在各重點大學中（例如：賓大、芝大與密西根大）廣設「國家資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s)、「國家南亞資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s for South Asia) 或「南亞語言資源中心」(South Asia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sup>⑤</sup>

除了「國防教育法案」對於區域研究的贊助之外，另一個贊助機制，則來自美國提供的國際糧食援助。1954 年美國總統艾森豪 (D. D. Eisenhower) 簽署了一項「農業貿易發展援助法案」(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ct, 簡稱 Public Law 480 或 PL480)，希望透過「以書還債」的方式，作為協助被援助國抵債的方式，但其結果卻戲劇性地提高美國區域研究的成果（像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甚至在新德里成立辦公室，專門負責蒐集書並將影本提供各重點大學圖書館）。<sup>⑥</sup>

然而在政府的力量之外，民間基金會與組織的力量，在 1950 年代之後，仍然對於區域研究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從 1950 年開始，福特基金會便設立著名的「外國區域獎學金計畫」(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 簡稱 FAFP)，作為第一個全國性贊助區域研究訓練的計畫（獎勵研究生與學者的海外研究）；1972 年之後，福特基金

註④ Susan S. Wadley, "Anthropology,"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Delhi: Manohar and AHS, 1998), pp. 120-132.

註⑤ Alyssa Ayres, "Beyond Disciplines: Indi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20-25.

註⑥ Maureen L. P. Patterson, "Institutional Base for the Study of South As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ol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Delhi: Manohar and AHS, 1998), pp. 32-37.

會更將「外國區域獎學金計畫」加以轉型，改爲由「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簡稱 SSRC) 共同聯合「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簡稱 ACLS) 設立的「區域研究委員會」(Area Studies Committees), 擔任審核研究計畫、獎勵與補助、舉行活動的重要單位。<sup>27</sup>此外, 像是著名的「佛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s), <sup>28</sup>也從 1960 年代起, 大幅擴張其對於研究生和學者海外研究與交流活動的資助範圍。

除了少數梵文學家之外, 早期南亞研究者其實多半缺乏南亞語言知識, 而多依靠透過英語文獻或在地報導 (由於經歷長期英國殖民統治, 使得許多南亞資訊得以透過英文資料加以呈現, 這也使得區域語言對於南亞研究者的重要性, 不若中東或其它區域研究), 一方面因爲多來自其它學科, 二方面則因爲其研究主題對於區域語言的需求較低 (例如: 選舉分析便較少面臨區域語言的隔閡), 但在政府支助之下, 新一代南亞研究者有機會接受區域語言和文化訓練, 像是賓大、芝大、柏克萊等校, 在這段期間中也開始增聘具有語言專才的教師。1961 年, 在基金會與「農業貿易發展援助法案」贊助之下, 布朗召集美國各大學南亞研究力量, 共同組成「美國印度研究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簡稱 AIIS), 協助南亞研究者進行區域語言訓練, 並提供博士生和教師研究獎金, <sup>29</sup>而該學會的成立, 也標誌著美國南亞研究社群的正式成形。

得益於上述有利的大環境發展氣氛, 南亞研究在美國大學中逐漸以二種制度形式出現: 第一種是南亞研究系所。例如: 芝大南亞研究系所; 其可以頒發學位並教授語言、文學、歷史、宗教或政治課程; 儘管這些系所都是跨學科取向, 但通常比較偏重人文學徑路; 第二種是南亞研究中心、機構或計畫。其可能會贊助少數區域研究課程, 但卻不授予學位。<sup>30</sup>無論如何, 龐大的資金挹注, 一時之間, 使得語言和外國研究

註<sup>27</sup> 「社會科學研究會」與「美國學術團體協會」二會共同先後成立十一個這類聯合性的「區域研究委員會」投入區域研究, 其中南亞研究委員會乃成立於 1975 年, 但這些委員會在 1997 年卻被屬性類似的「地區顧問專題討論小組」(Regional Advisory Panels) 取代 (詳見後述)。

註<sup>28</sup> 「佛布萊特計畫」是由美國參議員佛布萊特 (J. W. Fulbright) 於 1946 年設立的獎學金與研究獎勵制度, 得到美國國務院、其它國家和民間組織的贊助, 旨在透過人員與知識交流, 增加美國与其它各國之間的相互瞭解; 參見 <http://www.fulbrightonline.org/>

註<sup>29</sup> Maureen L. P. Patterson, "Institutional Base for the Study of South As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ol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pp. 41~43.

註<sup>30</sup> 這些系所在區域研究崛起初期, 扮演培養區域專才的重要角色。到了中期, 培養出來的大量學生也開始向傳統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系, 爭取教職。幾乎所有區域研究教師都有一種雙重認同身份, 例如: 兼具社會學家與南亞專家的雙重身份。儘管這些系所培養的畢業生數量相對較少, 但卻仍然無法提供教職給她們, 也因此, 這些系所在 1990 年代便逐漸面臨缺少學生的危機;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上述區域研究模式之外, 1950 年代開始, 另一種在美印雙邊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區域研究發展模式, 則是一個結合美國公立大學力量與印度農業與經濟發展計畫的合作模式; 從 1952 年到 1973 年 (後來因爲印度總理甘地 (I. Gandhi) 遇刺而中斷), 印度曾經邀請美國幾所公立大學 (像是密西根州大 (Michigan State) 與俄亥俄州大 (Ohio State)) 投入研究與人力, 協助其改善其國內的教育、農業和工程方面的發展現況。2005 年, 印度總理辛 (M. Singh) 造訪美國華府之後, 美印雙方又宣佈希望重啓這類合作計畫; 參見 Alyssa Ayres, "Beyond Disciplines: Indi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28~29.

成爲各領域學者躍躍欲試的研究主題，而這也更進一步強化區域研究跨領域的特色；事實上，在南亞研究早期的發展中，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很多彼時投入南亞研究的學者，都是來自不同傳統分科（無論是社會學、人類學或政治科學等等）。

唯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日後許多論者批評區域研究是冷戰的侍女，但從上述的描繪中，我們其實已經可以看到，區域研究發展的背景因素似乎遠比這些批評更爲複雜；儘管美國官方曾經希望讓學術研究成果與國家安全目標相互結合，但實際上，大學自主性的發展，以及民間資金的大量挹注，使得美國官方始終無法真正操控區域研究的實際發展方向，甚至我們也可以持續看到，由於在地觀點的累積，反而使得區域研究學者往往成爲美國官方政策的批評先鋒（特別在越戰、古巴危機、印巴衝突時期）。<sup>①</sup>換句話說，儘管仍然有某些學者運用美國觀點和模式看待世界，但區域研究其實早已超越這個限制，深具多樣性。

從 1960 年代開始，越來越多不同領域優秀學者開始投入南亞研究，許多質量兼具並深具反省力道的研究也相繼出現；然而若相較於其它區域研究領域（側重當代議題），我們卻還是可以清楚看到，大部分的南亞研究仍然偏重語言、宗教或哲學領域；儘管布朗從很早開始，便極力提倡一種融合傳統與現代關懷的南亞研究，但許多南亞研究始終未能擺脫濃厚的「古典主義」色彩（一方面仍然深受「印度學」知識傳統影響；一方面著重古典語言訓練的結果，也繼續強化這方面的特徵）。

在這種情況之下，透過跨學科觀點、方法和視野的投入，南亞研究者也開始積極尋求新的研究定位，希望能夠徹底擺脫既有研究限制與框架，突破外部研究者的侷限性，尋求對於南亞次大陸複雜現象的真實理解。在這一系列努力過程中，由馬里歐特和英登（R. Inden）二位學者在芝大所推動的「印度民族社會學」（Ethno-Sociology of India）浪潮，則可以作爲一個切入瞭解這個過程的適例。對於馬里歐特和英登二位學者而言，他們最關注的問題，或許就是：「對於美國學者而言，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印度？」誠如英登自己所言，爲了想像印度，外部研究者經常將印度加以本質化，而其本質化的基礎，則立基於「印度學」傳統所積累各種假定之上。例如：學者們對於印度種姓制度的想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sup>②</sup>

註① 相較其它由國家主導的社會，美國依賴獨立大學生產其對於外國事務的知識，區域研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儘管一開始有其冷戰安全考量，但仍然建立在一種假定之上：學院「獨立性」（以及附隨其上的學術自由）可以作爲政府界定何謂國家利益時的重要制衡機制（避免國家壟斷權力、濫用權力或成爲極權國家），聯邦基金的投入就是承認學術自由在生產關於這個世界知識中的重要性。即便是在越戰時期，大學也普遍批判美國東南亞政策，並批評中情局運用學術資源在智利從事工作；這種情況使得獨立學者和政府政策制訂者關係經常處於一種合作與緊張關係；參見 Michael D. Kennedy, "Ideological Diversity and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in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Vol. 11, No. 2-3, 2004, <<http://www.umich.edu/~iinet/journal/vol11no2-3/kennedy.htm>>.

註② R. Inden, *Imagining India*, pp. 51~73; M. Marriott and R. Inden, "Toward an Ethnology of South Asian Caste Systems," in K. David, ed., *The New Wind: Changing Identities in South Asia* (The Hague: Mouton, 1977), pp. 227~238.

在這種立場描繪之上，我們不難看到，身為南亞研究的一員，彼時許多美國學者其實開始關心區域研究的視野，是否能夠呈現出關於南亞的真實面貌？與此同時，研究者又應該採取何種立場與方法，始能獲致南亞的真實面貌？事實上，由於這些問題也是人類學領域長期爭論不休的一個重要課題，加上芝大南亞研究長期以來深受人類學影響，也使得這些問題的辯論在一時之間躍身成為芝大南亞研究的焦點。

從馬林諾夫斯基 (B. Malinowski) 以降，人類學者便已經認識到擺脫種族中心主義，以及從被研究者觀點看世界的重要性，但致力於探究種姓文化意涵的馬里歐特，卻認為既有探究南亞的途徑無法達到此一目的。為了突破既有研究的侷限，馬里歐特開始與歷史學家英登合作，二人於 1970 年代撰寫了一系列論文，提出一種新的「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 方式，結合「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 與「脈絡式的田野調查」(contextual fieldwork)，以發掘「本地的」(native) 詞彙。<sup>33</sup>在這種意義之下，「印度民族社會學」便意指一種屬於印度觀點的民族社會學，而非一種西方觀點的民族社會學。<sup>34</sup>

「印度民族社會學」在芝大中位居要角，也帶來了許多論文與研討會；像是身為美國印度社會歷史研究先驅並任教於芝大的科恩 (B. Cohn)，也同樣深受這種學術倡議影響，進而不斷反思既有南亞歷史研究的材料與方法。科恩認為，歷史家的觀察容易帶來靜態化的想像，而這種靜態的想像則被社會科學家 (區域研究者) 所沿用；然而真實現象的複雜性，往往遠遠超過研究者的想像。<sup>35</sup>因此科恩企圖讓未來南亞歷史研究經驗化，讓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結合歷史研究，透過田野調查工作，獲得印度歷史書寫的新資料；另一方面，在檢視過去南亞歷史的書寫問題時，科恩也逐漸注意到英國殖民統治力量在殖民知識建構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他的批評帶動了日後一系列針對殖民知識的批判 (早於東方主義)，而他對於印度殖民經驗的卓越研究洞見也引領了日後大量針對前殖民國家的歷史與人類學研究 (他本人甚至曾經參與「屬民研究」歷史計畫)。<sup>36</sup>

儘管包括許多印度學者在內 (像是瑪登 (T. N. Madan) 與達斯 (V. Das)) 也深受

註<sup>33</sup> M. Marriott, "Constructing an Indian Ethnology," in M. Marriott, ed., *India through Hindu Categories* (New Delhi: Sage, 1990), pp. 1-39; M. Marriott, "Constructing an Indian Ethnology,"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Vol. 23, No. 1 (1989), pp. 1-41.

註<sup>34</sup> Kelly D. Alley,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y of India," *India Review*, Vol. 5, No. 1 (2006), pp. 122-143.

註<sup>35</sup> Bernard Cohn,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Delhi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94-196.

註<sup>36</sup> 科恩本人最重要的論著，包括：歷史學家中間的一位人類學者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Historians*) (1987)、殖民主義與其知識形式：英國在印度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1996)；另外像是曾經客座於賓大與芝大的古代印度歷史學家史坦 (B. Stein)，也希望結合歷史與人類學，修正過於重視抽象文化分析和印度學關懷的傾向；另外還有受聘於芝大任教政治科學的魯道夫夫婦 (L. I. Rudolph and S. H. Rudolph)，在其 1967 年出版的傳統的現代性 (*The Modernity of Tradition*) 一書中，也引用很多來自印度當地的實地調查資料，討論現代化對於傳統社會的影響。

此種研究取徑吸引，但其實芝大之外，許多社會學家仍然無法認同「印度民族社會學」的訴求；儘管「印度民族社會學」鼓勵古典文本和民族誌相互結合，但此種將「印度學」與「人類學」輕率混合的嘗試，其實並未能真正跳脫本質化南亞的框架（仍然具有將南亞「非時間化」與「宗教化」的傾向），而其本身也仍然是一種西方主流社會科學觀點的展現，<sup>37</sup>不過這項嘗試卻還是能體現出一種對於早期南亞研究的重要反省。我們可以看到，在南亞研究摸索與發展的過程中，這類植基於知識上的反省與批判，始終在這個融合傳統與現代知識傳承的跨學科領域中，扮演一個非常顯著的角色，後殖民和文化批判的興起，則將這一股反省和批判力量推展到另一個新的階段。

### 參、南亞研究的後殖民與跨學科挑戰

在薩伊德（E. Said）出版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之後，區域研究便開始面對一種更為精巧的批評。不論其具體貢獻為何，東方學和區域研究知識傳統一律被貼上反動標籤，<sup>38</sup>控訴這些知識觀點承載具有殖民主義偏見的觀念和理論，並讓當代歐美得以延續和擴張其霸權力量。薩伊德認為，長期以來，西方知識界便把東方塑造成單一、刻板、靜態的形象，過度簡化、二分、通則化東方與西方的差異面。<sup>39</sup>區域研究者雖然越來越重視不同區域之間的細微差別，不再將刻板印象強加於特定區域，但薩伊德卻還是堅持近代區域研究其實是東方主義傳統的延伸，因為二者同樣源自於西方霸權興起的需求，藉由透過東方或非西方知識的建構，提供擁護西方「優越論」的重要論證基礎，而二者背後也同樣具有政治與經濟上的目的。也因此，薩伊德將區域研究形容成一種「知識帝國主義」（*intellectual imperialism*），並反對這種根據「宗教、權威、地理界定的學科」（*disciplines defined canonically, imperially and geographically*），強調「學科應該根據知識性質加以界定」（*disciplines defined intellectually*）。<sup>40</sup>

然而東方主義對於區域研究的批評是否允當，也在區域研究者中間引起不同的看

註<sup>37</sup> Nicholas B. Dirks, *The Hollow Crown: Ethnohistory of an Indian Kingdo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p. xii-xvii.

註<sup>38</sup> 儘管德國在南亞的殖民力量不若英國，但受到雅利安種族理論和印歐語系概念的影響，德國對於南亞的學術關注卻遠甚彼時的英國（體現在印度學的高度發展之中），並融合許多浪漫主義思潮（例如：假定南亞曾經擁有「輝煌的過往」與「墮落的現在」），進而影響彼時歐洲大陸對於南亞的認識（甚至影響南亞菁英對於自身傳統的重新詮釋）；我們可以看到，受到東方主義批判觀點的影響，許多學者也開始從後殖民觀點重新檢視此種南亞認識的建構過程（特別是許多印度學的假定），進而揭示現今南亞研究如何繼續深受此種認識傳統的影響，像是英登的想像印度（*Imagining India*）（1990）、馬基德（J. Majeed）的無法駕馭的想像：詹姆士密爾的英治印度史與東方主義（*Ungoverned Imaginings: James Mill's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and Orientalism*）（1992）與特勒歇爾（K. Teltscher）印度銘刻：歐洲與英國對於印度的書寫（*India Incribed: European and British Writing on India*）（1995）等等一系列論著，都是這類學術努力的代表。

註<sup>39</sup>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 pp. 1-28.

註<sup>40</sup>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p. 107-108.

法與激烈的辯論。<sup>④</sup>許多論者便認為，傅科（M. Foucault）對於知識和權力關係的闡述雖然確有其旨，但非僅有區域研究會出現無法擺脫政治偏見的情況，所有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研究，無論是由內部或外部研究者所進行，其實也都無法擺脫政治偏見。所有美國與非美國學者，包括區域研究的批評者在內，其實也都受到她們所身處的政治脈絡影響，因為政治權力本來就無可避免地將形塑議題的呈現方式與其實際內容，並決定何者將從研究中獲益。因此如何選擇研究問題、強調那些研究面向，都會牽涉到研究者的價值取捨，就算是內部研究者也一樣，權力永遠將形塑社會知識的內容。換句話說，批評區域研究缺乏內部觀點且無法擺脫政治偏見的看法，其實乃是過度誇大區域研究在知識與權力關係上的表現；更重要的是，這些論者認為，相較於美國傳統分科中對於其它世界的傲慢觀點，<sup>⑤</sup>以及其在世界各地所激起的反感，關注在地聲音的區域研究，其實正可以作為一種觀點調節的力量。<sup>⑥</sup>

另一方面，論者也認為，區域經濟背後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動機，並不能作為我們拒斥其觀點的唯一理由。因為其實現今所有學科幾乎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經動機（例如：物理、化學、政治與經濟等）；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將區域研究積累的知識單純簡化為一種權力宰制關係或霸權論述，質疑所有區域研究者背後的動機。因為誠如史華慈所言，如果我們非要以這種方式看待區域研究，那麼，其實「所有知識都是一種宰制模式。」<sup>⑦</sup>事實上，薩伊德也曾經肯定過去東方學和區域研究的某種正面貢獻，特別是在對於非西方認識不足的情形之下，能夠對於非西方世界達成那種程度的認識，其實已經相當難能可貴；在這種情況之下，遂論者嘗試提出調和之道，指出東方主義真正致力批評者，並非單純的東方學和區域研究，而是其背後對於東西方差異性「本質化」的傾向，以及將東西方截然二分對立的區隔，因為東方在這種刻板劃分之下，似乎變成一個死氣沈沈、陰柔靜態，甚至是一個「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世界；<sup>⑧</sup>在這種認識架構之下的東方知識，以及攀附其上的權力關係，其實也才是東方主義者真正關注的核心。

---

註④ 事實上，賓大也曾經專門針對東方主義對於南亞研究的影響舉行一系列正式的研討會，1988 年到 1989 年間，更舉行為期一年的「東方主義與超越：南亞觀點」（*Orientalism and Beyond: Perspectives from South Asia*）學術研討會，最終，許多重要討論都被放入東方主義與後殖民困境：南亞觀點（*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1993）一書中。

註⑤ 儘管許多主流學科的鉅型理論聲稱具有普世性，但其實在取材與視野上仍然侷限在西方脈絡之下，同時也經常流露出一種西方中心主義或優越論，像是「發展理論」（*Development Theory*）便把西方視作世界發展的標竿，而其它許多類似的鉅型理論對於尚未達到西方發展狀況的非西方區域，也總會套用「落後社會」（*backward society*）、「傳統社會」（*traditional society*）、「發展遲緩」（*retarded growth*）這類詞彙，刻板地認識東方；參見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 111.

註⑥ Timothy Mitchell,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cial Science,"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rticle 3, 2003,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3/>>

註⑦ 原文：“All knowledge is a mode of domination;” 參見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 109.

註⑧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 109.

面對東方主義者的批評，南亞研究同樣無法置身事外；儘管早期南亞研究者對於薩伊德的論點抨擊激烈，<sup>④⑥</sup>但現在不僅幾乎沒有論者敢公然宣稱自己是一位東方主義者，對於東方主義論點的立場，也幾乎成爲所有南亞書寫都必須回應的一個重要主題；<sup>④⑦</sup>另一股同樣運用後殖民觀點挑戰西方殖民主義霸權話語以及其中心地位的運動，則是由古哈（R. Guha）首先於南亞展開，並造成極大的迴響「屬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sup>④⑧</sup>屬民研究致力於對抗傳統印度歷史書寫中濃厚的菁英主義（elitism），無論是一種殖民菁英主義形式，或是一種民族主義者的菁英主義形式。<sup>④⑨</sup>在史碧娃克（G. C. Spivak）投入屬民研究行列之後，這場原本屬於比較歷史學領域的運動，在美國便開始成爲一種政治力量並散佈至其它領域，甚至成爲「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象徵，而這場運動也帶給了傳統南亞研究極大的刺激與推動力量，進一步鼓勵社會科學與人文學之間的相互聯繫。

在美國，屬民研究意味一種從底層發聲的歷史觀點，以及對於上位歷史觀點的後現代超越；<sup>⑤⑩</sup>但在南亞，屬民研究卻已經變成一個辯論現代性、啓蒙運動、國家機器定位、傳統文化適應性的場所；然而弔詭的是，儘管一系列東方主義和屬民研究批判，對於解消西方中心話語極具批判力，但後殖民批評家卻往往並非真正來自殖民地，而是擁有殖民地血統並在第一世界話語圈中發言的菁英，她們對於主流話語的批評，被認爲只是爲了在主流話語圈中爭取一席之地。因此究竟這些後殖民批評是否已經「超越」殖民主義，抑或，只是「繼承」過去的舊殖民主義體系，並成爲一種「新殖民主義」，則似乎仍存在許多爭議的空間。<sup>⑤⑪</sup>

事實上，這些一系列企圖解構西方中心話語的批判，其核心關注皆指向一個關鍵的問題：亦即，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南亞？如何理解曾經擁有過殖民經驗的南亞？如何在東西方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情況之下，建構我們關於南亞的知識？這些來自於智識上的嚴峻挑戰，不僅是比較歷史學者關注的重要議題，更是現今所有南亞研究者必須面對的重要理解前提。例如：普拉卡什（G. Prakash）便曾提出一種「後基礎論歷史」（post-foundationalist history），主張任何企圖把握南亞現代歷史的嘗試，都必須謹

註④⑥ David Kopf, "Hermeneutics versus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89, No. 3 (1980), pp. 495~506.

註④⑦ Nicholas B. Dirks, "Introduction: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in Nicholas B. Dirks, ed.,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p. 8~10.

註④⑧ Ranajit Guha,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屬民」又譯作「屬下」或「底層」，首見於葛蘭西（A. Gramsci）在論述階級鬥爭時作爲馬克思無產階級概念的替代性詞彙。「屬民研究」歷史學家繼承了這個概念並用於南亞歷史的研究。

註④⑨ David Ludden, ed., *Reading Subaltern Studies: Critical Histories, Contested Meaning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outh Asia*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Publishers, 2001) .

註⑤⑩ Benjamin B. Cohen,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in the US Academy," *India Review*, Vol. 5, No. 1 (2006), pp. 144~172.

註⑤⑪ Frank F. Conlon, "History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Delhi: Manohar and AIIS, 1998), pp. 283~305.

慎面對她們藉以「再現」南亞的語言和概念，並不斷批判與注意這些語言和概念背後的建構歷程；<sup>②</sup>儘管普拉卡什的倡議容或有爭議之處，<sup>③</sup>而他的倡議也不能全面代表學界對於上述批判的立場，但他在歷史學領域中的反省，卻體現出上述批判對於相關南亞研究視野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對於殖民主義的討論，不僅讓晚近南亞研究擺脫最初區域研究議題的設定，同時也增加了我們對於現代性的批判。

儘管對於如何回應上述批評，在南亞研究者中間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但一個日漸顯著的發展趨勢，卻可能有助緩和上述批評的攻訐力道，而這個重要的發展趨勢就是南亞研究社群（特別是在美國學術界）日益國際化的傾向。近十幾年來，美國區域研究最大的轉變，或許就是承認區域研究不再是專屬於美國的學術研究活動。在過去，美國南亞研究最常聯繫的國家，也不是南亞諸國，而是具有南亞殖民經驗的英國。幾年以前，「社會科學研究會」根本沒有來自南亞的學者，而現在情況卻已經明顯改觀；與此同時，南亞的新知識與政治運動（像是前述的屬民運動或方興未艾的民族主義）所帶來的本土觀點，<sup>④</sup>也積極挑戰美國學院的霸權觀點。當然，這種人員與觀點的持續交流，一方面或許可以成為和緩上述批評的力量，二方面也可能有助於區域研究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任務（詳見後述）；至於，美國學術霸權與學科分工框架將如何回應這種挑戰？則似乎有待進一步地觀察。

在區域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其實更多的攻訐是來自於不同的分科；事實上，從 1950 年代福特基金會致力投入區域研究開始，直到 1970 年代「社會科學研究會」與「美國學術團體協會」聯合設立「區域研究委員會」為止，跨學科始終被視作區域研究最重要的特徵之一，一方面挑戰既有分科企圖「普遍化」(universalize) 西方經驗的架構，二方面挑戰各分科勢力構築的學院運作體制；不過，儘管區域研究已經行之多年，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各分科的反擊力道依然強烈。

一個促使傳統分科（特別在社會科學領域）不斷批評區域研究的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實證主義傳統心態。因為在這些批評者眼中，區域研究被認為「沒有理論」。這

---

註<sup>②</sup> G. Prakash, "Writing Post-Orientalist Histories of the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from Indian Historiograph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2, No. 2 (1990), pp. 383-408.

註<sup>③</sup> 例如：瓦許布魯克 (D. Washbrook) 與歐漢倫 (R. O'Hanlon) 便批評普拉卡什刻意忽略階級因素，以便遮掩自己在資本主義體系中作為勝利者而非受害者的立場，讓後現代對於文化的焦慮取代核心經濟因素的重要地位，並將文化過度神秘化。二人認為，唯有透過階級與歷史唯物主義分析作為所有歷史研究的基礎，始能揭示政治因素於「再現」南亞過程中的位置，因為一個關注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必須要證明文化差異性的虛假性，指出全球化在人們中間所造成接觸生產工具機會的差異性，而非民族、種族、族群這類副現象的探究，但像是科恩和普拉卡什這些人類學家與屬民研究者的最大問題，就是太過關注族群、民族與種族等等因素，反而讓殖民主義變成現代歷史研究的主要類別；詳參 D. Washbrook and R. O'Hanlon, "After Orientalism: Culture, Criticism, and Politics in the Third Worl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4, No. 1 (1992), pp. 141-167.

註<sup>④</sup> Jan Nederveen Pieterse and Bhikhu Parekh, "Shifting Imaginaries: Decolonization, Internal Decolonization, Postcoloniality," in Jan Nederveen Pieterse and Bhikhu Parekh, eds., *The Decolonization of Imagination: Culture, Knowledge and Power*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9.



類批評強調，區域研究只是在作描述（description）工作，拒絕一般社會科學分科的理論建構（theory building）與通則化（generalizing）工作。因此區域研究只能帶來新奇的觀察，卻無法提出理論，頂多可以提供分科學者在未來建構普遍性理論時的參考資料（相反的，區域研究者則批評，這些分科學者經常忽略其資料本身具有的特殊脈絡性）。一般而言，深受康德「純理論」（pure theory）（從「純理論」可以延伸出其它命題接受檢證，企圖從資料蒐集中建立經驗通則（empirical generalization））觀念影響的所有主流的人文與社會學科，最容易提出這類批評；此外，像是深受量化技術與形式模型（formal modeling）影響的經濟學（儘管在「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與「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興盛時，經濟學家也曾在區域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sup>55</sup>），以及實證傾向越來越強的社會學與政治科學（在這些主流社會科學分科中，也很難看到它們會聘用區域研究者，特別是專以特定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者）；<sup>56</sup>相較之下，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這類比較強調脈絡性的社會科學或人文學分科，則較少從這個角度批評區域研究（它們較多從區域研究與國家安全之間的聯繫，質疑區域研究知識的正當性）。<sup>57</sup>

面對缺乏理論的批評，史華茲也曾經挺身為區域研究辯護，並套用著名科哲學者波普（C. Popper）觀點，駁斥粗糙的實證主義論調，據而指出：「所有觀察都受到理論指導。」區域研究者絕非單純地蒐集事實，因為這些事實背後都潛藏著深刻的理論意涵。區域研究者所使用的詞彙不一定侷限於某一個學科，也未必符合某一個學科的紀律，而常常是來自一般性用語（generally accepted ideas）；<sup>58</sup>事實上，透過對於關鍵議題提出新資料、新觀念、新途徑、新詮釋，區域研究往往甚具理論洞察力，而跨學科的協力合作也刺激分科重新思考自身學科內部的理論問題（畢竟很多區域研究者還是任職於分科之內）；更重要的是，在區域研究者眼中看來，那些批評區域研究缺乏理論意涵的分科論者，其實始終忽略了一項重要事實：一直到現在為止，那些被奉為典範的主流理論觀點和資料取材，其實仍然都侷限在某些特定地區（例如：北美和歐洲），但分科論者卻偏偏要把侷限性的通則結論「普遍化」推展到世界各地，把北美和歐洲的經驗，當作世界各地的經驗。

在許多實際情況中，區域研究仍然需要分科提供清楚的概念與方法，而分科也需要區域研究作為修正美國中心觀點的力量，彼此存在著一種既對抗又合作的微妙關

註<sup>55</sup> Alan Heston, "Economics,"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Delhi: Manohar and AIIS, 1998), pp. 189~209.

註<sup>56</sup> Nicholas B. Dirks, "South Asian Studies: Futures Past,"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rticle 9, 2003,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

註<sup>57</sup> M. Miyoshi and H. Hartoo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註<sup>58</sup>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 103.

係，許多論者也不斷積極為雙方尋求和解模式；<sup>⑤</sup>但既有學院分工體制的牢不可破，以及附隨其上的特殊學院生態，卻使得不斷挑戰並轉化學院分科紀律的區域研究，迄今仍然遭受到來自學院內部強大的阻力。我們必須瞭解到，現今歐美學院分科的建立，其實是 19 世紀的產物，並以此分工觀點看待世界：經濟學處理市場、政治學處理國家、社會學處理社會、心理學處理個人、歷史學處理過去；而人文學也存在類似的分工：文學、哲學、歷史、宗教、藝術等等，彼此截然劃分，各自獨立運作，並漸漸形成自己的議題、概念、課程、方法、次領域、期刊、組織與制度；<sup>⑥</sup>儘管最早從 1920 年代，便已經有批判聲音出現，認為這種分工無法適應現代社會，壁壘分明的分科化與專業化不僅削弱學科整合的能力，複雜的社會現象也經常彼此相互影響，不能分割獨立處理。因此許多學者遂開始尋找不同系所的同好，科際整合研究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但在多年的努力之後，分科界線卻依然不動如山；迄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在一般研究型大學中，資源分配、聘用、升等、出版、課程規劃，甚至何謂「重要知識」的界定，幾乎還是由分科系所決定，而跨學科的嘗試也經常遭到詆毀與邊緣化。

值得注意的是，各人文或社會學科對於區域研究的輕視，往往並非僅因區域研究無法合乎現有的學術分工架構，更是因為這些學科本身所具有的濃厚「科學主義」(Scientism) 偏見。受到啓蒙理性和自然科學典範的影響，這些學科往往未能認識到，所謂的不同學科，其實只是人類為了解自身不同經驗所大致劃分的幾個領域，但是這些學科卻把這種劃分絕對化，各自擁有彼此無法溝通對話的模型、方法論、理論與專業用語。<sup>⑦</sup>在此種分科夾擊區域研究發展的背景之下，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以跨學科視野自詡的南亞研究，儘管從一開始便企圖將南亞研究納入傳統分科結構之中，但南亞研究系所卻仍然受到其它分科的輕視，質疑其理論典範和學科紀律；相較之下，同樣強調跨學科的南亞研究中心，由於並未直接企圖挑戰其它系所或分科，同時

註<sup>⑤</sup> 巴特 (R. H. Bates) 便曾以政治學界為例指出，區域研究專家多半曾經受過多學科訓練而具有多學科主題關懷，不僅關心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政治，也關心其歷史、文學、文化、語言等面向，不僅引用人文學著作，也引用社會科學著作，同時經常援用田野調查方法，而她們的作風很容易讓人想起民族學家：區域研究的聽眾可以來自不同領域；相較之下，那些自詡為是社會科學者的政治學者，則企圖找出法則，發展「大理論」(general theories)，並從中演繹和測試假設，她們不是在尋求對於某個區域的深度理解 (a deep understanding or verstehen)，也未必注意脈絡聯繫性，她們最終的企圖是要建立超越區域聯繫性的規則；然而巴特也認為，「區域研究」與「分科」之間並非無法相容，區域研究所提供具有脈絡性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應該被整合進入他所謂的「整體分析架構」(General Analytic Framework) 之中；不過，巴特也反對某些區域研究者拒斥進行理論通則化的態度，並強調希望透過個案抽繹出邏輯規則，藉以作為未來更進一步的分析工具；詳參 Robert H. Bates,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A Useful Controvers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97), pp. 166-169; Chalmers Johnson, "Preconception Versus Observation, or the Contribu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97), pp. 170-174.

註<sup>⑥</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ed.,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sup>⑦</sup>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 101.

傾向接受大學的分科文化與結構，也因此的發展上所遭遇的阻力則比較小。<sup>②</sup>

另一個值得區域研究反省的問題，則是其經常強調成果無法從事比較分析。因為每個社會文化都具有無法比較的獨特性，而比較研究的進行卻必須要在一個更高的共同基礎和框架之下來進行，然而「更高的共同基礎和框架」卻似乎預設不同社會文化之間具有更根本的「共同性」，可以從事進一步地比較研究；否認不同社會文化之間可以進行比較的區域研究者，大多是受到文化人類學和語言學的影響，但其實區域研究並不反對比較工作（當然，相較於其它學科粗糙的比較工作，區域研究者的比較研究自然必須更重視文化與歷史層面），<sup>③</sup>也希望透過比較工作的進行，提供一個具有更廣泛基礎的區域研究理論；唯由於區域研究在整個學術界中仍屬弱勢，因此其往往忙著回應挑戰和募款，而未能真正著手嚴肅思考這類基礎工作；過去，區域研究只是不斷以機會主義式的態度運用各分科的概念和方法，未將其自身研究成果系統性累積，也因此，當冷戰結束之後，社會科學開始向其再次發出挑戰之際，區域研究便雙手投降；更重要的是，由於區域研究社群被不同分科所切割，各有各分科體制的考量，再加上區域研究資金受到壓縮、相互競爭，使得成員之間根本無法彼此聯繫，但一種具有更廣泛基礎區域研究理論，卻是需要不同成員的共同合作。<sup>④</sup>在這一方面，應該扮演理論推動者角色的區域研究組織，也似乎未見其突出的表現（非洲區域研究已略有進展，但南亞研究則仍在原地踏步）。<sup>⑤</sup>

## 肆、全球化之下的南亞研究現況

由於許多學者認為，區域研究只是一項政治工具，其目的僅在於「瞭解敵人」（know the enemy），<sup>⑥</sup>因此在冷戰終結之後，其階段性任務自然可以告一段落。這種論調多來自政治科學，以及反對美國外交政策與國際活動的左派學者，她們將區域研究看作是美國霸權的同路人與支持者，阻礙美國之外的世界進步；然而如前所述，儘管國家安全與利益考量的確是早期區域研究推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種論調似乎卻

註②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rticle 1, 2003,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

註③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p. 105~106.

註④ David Ludden, "Area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Vol. 6, No. 1, 2000, <[http://www.frontiersjournal.com/issues/vol6/vol6-01\\_Ludden.htm](http://www.frontiersjournal.com/issues/vol6/vol6-01_Ludden.htm)>

註⑤ Frederick Cooper, "Conflict and Connections: Rethinking Colonial Af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9, No. 5 (1999), pp. 1516~1545.

註⑥ Harry Harootian and Naoki Sakai, "Japa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7, No. 2 (1999), pp. 596;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 in Andre Shiffrin, ed.,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The New York Press, 1997), p. 200.

過度簡化區域研究的複雜發展歷程與內涵；事實上，早在冷戰時期，區域研究便已高度多樣化；唯無論如何，隨著 1990 年之後東歐共產國家的土崩瓦解，許多論者開始認為，由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抗已經走向終結，<sup>⑦</sup>在下一個世紀將會走向全球化，在這個由美國所領導的全球化新時代中將不再有冷戰對手，而美國也亟需瞭解這個新時代。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論調，而這種對於後冷戰與全球化時代變遷的期待，也使得區域研究必須面臨一系列相互關連的挑戰。

事實上，從 1980 年代開始，聯邦資金並未配合通膨調整，便已經導致實際注入區域研究的金額下降。冷戰結束之後，區域研究的國會遊說者也面臨難題，因為過去她們仰仗的軍需訴求，似乎無法繼續打動國會；面對國會可能刪減預算的威脅，在區域研究社群內部也激起了一系列激烈的聯邦基金保衛戰。為了爭取資金，現今區域研究者甚至必須面對來自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壓力；<sup>⑧</sup>儘管截至目前為止，基於美國企業全球擴張的需求，以及在眾多美國移民社群的大力護航之下（例如：南亞移民社群便在美國學院中大力推動南亞課程，詳見後述），暫時保住了聯邦基金，但整體而言，官方刪減預算的威脅始終沒有消除。不同於政府的立場，儘管私人部門並非完全導因於冷戰威脅而從事區域研究，但在冷戰終結之後，它們也開始懷疑區域研究的未來；「社會科學研究會」也以冷戰結束為名，要求其區域研究計畫改變。幾個重要民間基金會（包括最重要的福特基金會在內），也舉辦一系列討論區域研究的未來。

「社會科學研究會」與三大基金會也知道新時代需要新知識。面對這種形勢，對於區域研究的批評始於「社會科學研究會」主席費勒曼（D. Featherman）。他重新強調分科的優越地位，指出傳統社會科學分科遠比區域研究更具應用性、全球性、實用性，並支持「紮實的」（hard）社會科學，像是經濟學、政治科學、社會學、運用統計資料、形式模型、實證理論，進而主張縮減「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協會」所共組的聯合委員會勢力（誠如前述，一直到 1989 年為止，十幾個區域研究聯合委員會，已經維持長達三十多年，「社會科學研究會」預算幾乎有半數皆投入這些跨學科委員會（成員來自各大學區域研究教師），讓更多資金得以挹注那些「紮實的」社會科學；<sup>⑨</sup> 1996 年，「社會科學研究會」新主席普利維特（K. Prewitt）甚至完全解散聯

註⑦ 霍布斯邦（E. Hobsbawm）也稱 1989 年是「極端時代」（the age of extremes）的終結；參見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1996)。

註⑧ 例如：2003 年，美國眾議院小組委員會便曾經針對是否繼續贊助區域研究中心舉行聽證會，論者批評這些中心根本不在意國防並有反美傾向，而民間智庫和組織也附和這種觀點，最後主席建議成立一個顧問委員會，確保聯邦基金所支持的這些中心能夠更加反映這個世界的多方觀點；反對人士認為這根本誤會了區域研究中心的工作，成立委員會不僅沒有必要，也太花錢，但這種舉動背後似乎是一種新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誕生，即透過政治壓力，在學界中確保某種意識形態觀點的絕對地位；參見 Michael D. Kennedy, “Ideological Diversity and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in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Vol. 11, No. 2-3, 2004, <<http://www.umich.edu/~iinet/journal/vol11 no2-3/kennedy.htm>>

註⑨ David Ludden, “Area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Vol. 6, No. 1, 2000, <[http://www.frontiersjournal.com/issues/vol6/vol6-01\\_Ludden.htm](http://www.frontiersjournal.com/issues/vol6/vol6-01_Ludden.htm)>

合委員會，轉而成立「地區顧問專題討論小組」(regional advisory panels) (主要任務在推動更國際化的社會科學合作研究，突破過往以美國利益和民族國家為疆界的區域研究格局)，希望藉此催生一種具有全球化色彩的社會科學知識，以取代既有的區域研究；<sup>⑩</sup>1997年，福特基金會、「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協會」舉行聯合會議，召集各方學者，討論區域研究未來，與會人士強烈主張：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目前仍然需要區域形式的知識(但「地區顧問專題小組」依舊取代過去聯合委員會的運作)；在會議之後，福特基金會繼續挹注更多資源給區域研究，但也要求必須著重討論全球議題(特別是「全球知識」的追求，詳見後述)，福特基金會因此也成立了一項跨疆界計畫，重振區域研究，一方面繼續區域研究的成果，二方面鼓勵區域研究的創意發展，特別是跨疆界的研究。<sup>⑪</sup>

面對後冷戰與全球化的挑戰，我們可以看到三種對待區域研究的不同態度：實證性格較強的社會科學，更加強了過去對於區域研究的批評，強調自身理論與方法在全球化時代中的實用性，而區域研究被認為需要整合進入新社會科學知識之中；實證性格較弱的社會科學家，則仍然比較寬容地接受不同地方知識形式；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二種態度中間，以「社會科學研究會」為首的力量，開始引領另一種調和聲音，企圖透過「全球知識」(global knowledge)的追求重構區域研究，亦即，通過分科力量與區域研究的結合，讓普遍理論與地方實況相互聯繫(全球性觀點、地方性資料、應用與關懷)，進而創造一種廣納全球參與者、跨越邊界，擺脫帝國主義、傲慢的觀點。「社會科學研究會」將這種對於「全球知識」的追求，封為「具有脈絡敏感性的社會科學研究」(context-sensitive social science)。<sup>⑫</sup>

然而這種對於全球化與區域研究關係的定位，卻給予論者另一種重要暗示：是否全球化將有助於區域研究的發展？儘管許多論者認為，未來區域研究可能在全球化庇佑之下發展，但這種利用關係卻是機會主義式的，因為拘泥於區域之上的關懷根本有違全球化的初衷，甚至被認為是過時的，如同各式各樣的語言乃是全球主義的阻礙，過時的區域主義就像民族國家一樣阻礙全球化，阻礙知識的跨疆界流動；<sup>⑬</sup>簡單來說，如果我們不能瞭解區域研究知識與全球化進程之間長期的歷史互動關係，便無法為區域研究在全球化世界中找到新家。

現今對於全球主義(globalism)的崇拜，其實掩蓋許多全球化本身的地域性面向，以及區域研究在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事實上，區域研究很可能將代表一種對比

註<sup>⑩</sup> Kenneth Prewitt, "SSRC, ACLS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Area Studies," *LASA Forum*, Vol. 27, No. 1 (1996), pp. 10-12.

註<sup>⑪</sup> 參見 [http://www.fordfound.org/publications/recent\\_articles/crossing-borders.cfm](http://www.fordfound.org/publications/recent_articles/crossing-borders.cfm)

註<sup>⑫</sup> David Ludden, "Why Area Studies," in Ali Mirsepassi, Amrita Basu and Frederick Weaver, eds., *Localiz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1-137.

註<sup>⑬</sup> 論者批評，區域研究的空間分佈，大多來自20世紀中期殖民與後殖民時期的想像，而這種劃分知識的方式，將徹底被以全球性範疇的知識取代；參見 Tessa Morris-Suzuki, "Anti-Area Studies," *Communal/Plural*, Vol. 8, No. 1 (2000), p. 21.

於全球主義的學術力量，一種批判全球主義的觀點；因為全球化也具有地方特性，這個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以自己為中心經歷了自己的全球化，區域研究便應該致力描繪各地如何經歷全球化變遷。<sup>④</sup>區域研究應該跳脫美國為中心的思考，將全球化問題放在這個世界不同區域的視野當中，指出全球化發展中間的不一致性，不再將全球化視作沒有分別的單一進程；<sup>⑤</sup>區域研究一開始，雖然帶有帝國主義企圖，但現今區域研究則應該被放到全球學術網路之中（實際上，受益於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美國區域研究早已受到全球學術力量的刺激，開始嚴肅面對文化差異性的問題），代表一種美國之外對於全球化的學術發言；區域研究應該把握一項事實，全球化不可能消弭區域差異和特殊主義。<sup>⑥</sup>全球化其實並未帶來預期中的文化與政治趨同，反而加速各地權力與財富的分歧。像是族群衝突、認同政治、基要主義、恐怖主義都是全球化的結果，<sup>⑦</sup>這些現象的興起也促使全球化更加需要強調跨學科與脈絡性的區域研究作為媒介，瞭解各地在全球化之下的歧異性。<sup>⑧</sup>換句話說，區域研究對於區域層級的關注，仍將有助我們更加瞭解全球化底下的細微變遷和跨界流動。<sup>⑨</sup>現今區域研究者也應該要認識到，單純追隨「全球知識」潮流並不會為區域研究帶來資金，除非區域研究的獨特性與需求性

註④ Peter A. Jackson, "Space, Theory and Hegemony: The Dual Crises of Asian Area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18, No. 1 (2003), pp. 42~88.

註⑤ P. Hirst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註⑥ 儘管許多後結構主義理論批評空間性 (spatiality) 這種現代性、資本主義的觀念，並認為全球化將摧毀這種界分而帶來世界的趨同化（我們居住在一個單一的全球化世界並位處於世界終結），但這種普世性的宣稱毋寧是獨斷的、甚至仍然是西方的。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古老地域聯繫依然存在，新的地方文化變異性也不斷出現；這類忽略地域差異性的文化研究，似乎可以透過她們一層不變的後結構主義理論框架想像所有地區；參見 Peter A. Jackson, "Space, Theory and Hegemony: The Dual Crises of Asian Area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43~50.

註⑦ 因為認同乃密切聯繫於地域，但全球化卻撕裂的這種聯繫，侵蝕人們歸屬感；參見 Gearoid O. Tuathail, Andrew Herod and Susan M. Roberts, "Negotiating Unruly Problematics," in Gearoid O. Tuathail, Andrew Herod and Susan M. Roberts, eds., *An Unruly World?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Ge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20；民粹民族主義和族群中心主義的興起，也是現代國家認同失落的最佳表現；參見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Arif Dirlik,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Roxann Prazniak and Arif Dirlik, eds.,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sa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p. 15~51.

註⑧ 例如：今日美國面對全球化的時代，一方面身為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的推動者，一方面卻又更加迷戀於一種小鎮文化，嚮往安詳、寧靜、父權式家庭風格的小鎮文化，一種所謂的「美國方式」(the American way)。全球化讓跨國力量（無論是科技、經濟、文化）將成為驅動世界歷史的不可知的力量，社會生活將被超越民族國家控制的力量支配，然而人們習慣在民族國家當中安享民主與自治，面對沒有方向性和中心性的全球化，作為全球化中心的美國人民，也同樣陷入混亂與焦慮的處境之中，這不僅表現在其全球軍事的進退失據之上，也表現在其既接受卻又拒斥全球化的態度之上。從美國的例子當中，我們不難看到，儘管作為全球化潮流領航者的美國，在面對全球化時，內部也同樣仍然存在極大的歧異性。換句話說，透過強調跨學科與脈絡性的區域研究視野，可以讓我們更細膩地描繪全球化之下的多樣性。

註⑨ 論者認為，區域研究的邊界應該要更具有流動性，甚至應該廣泛納入「文化研究」的視野；參見 Harry Harootunian and Naoki Sakai, "Japa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p. 601；Ivan Karp, "Does Theory Travel? Area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Africa Today*, Vol. 44, No. 3 (1997), pp. 281~295.

能夠被非常清楚地突顯出來。

整體而言，儘管目前沒有一致的方案，美國學院體制仍然不斷透過各種方式企圖重構區域研究。更重要的是，學院行政單位也開始質疑區域研究的角色，其對於區域研究的支持與否，開始取決於區域研究是否能夠回應新全球化時代市場需求（包括為學校帶來資源）。過去，區域研究依賴政府支持；現在，研究者卻必須在校園中為資源而戰（為此，有些區域研究者已經轉型研究其它全球化之下的流行議題，例如：移民和族群議題。為了在各分科中生存，爭取獎勵、教職與升等。她們也必須加入那些不以區域作為劃分的跨學科研究計畫。區域研究計畫很多現在都已經被其它跨學科計畫取代）；<sup>⑩</sup>另一方面，學院和大學將發展重點集中於傳統分科的結果，不僅使得區域研究者奧援變少，也會影響研究生的養成（在時間與金錢有限情況之下，熟悉一種理論和方法的操作或研究（傳統分科的養成模式），絕對比強調全面理解一個區域的研究訓練（區域研究的養成模式），更具吸引力），<sup>⑪</sup>而這種變化也將驅使學院權力生態更向傳統分科傾斜，讓評鑑制度更加不利區域研究者。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可能耗費大量資金的南亞研究計畫似乎越來越難出現，而弱勢的南亞系所，也通常是學院中第一個被裁減的單位。<sup>⑫</sup>

毫無疑問地，在後冷戰與全球化時代之下，上述這些區域研究所面臨的整體發展氣氛，自然也成為考驗南亞研究的難題；不過近來幾個重要現象的出現，卻為南亞研究提供不同的發展和轉型契機：

第一個現象，就是 1998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繼進行核武試爆之後，第三部門（像是民間智庫和公共教育機構）對於南亞關注的遽增；那些規模較小、卻擁有較高影響力的研究機構或智庫（大多位於華府和紐約，政媒關係良好），為美國培養出一批智識專才。在這些機構當中，僅有少數關注國際議題，但在那些關注國際議題的機構內，印度與南亞的重要性也是一直到核武試爆之後才顯著提升。在此之前，除了由洛克斐勒贊助成立的「亞洲社」（Asia Society）之外（該社不僅擁有政策與當代事務部門，更透過藝術展覽、演講與論壇，持續在印度公共教育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些機構少有常駐南亞的專家，但現今像是「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布魯克林機構」（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國和平學會」（US Institute of Peace）、「外交關係協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等等機構，卻都陸續派駐專員於南亞地區，並將南亞專家置於機

註<sup>⑩</sup> David Ludden, "Area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Vol. 6, No. 1, 2000, <[http://www.frontiersjournal.com/issues/vol6/vol6-01\\_Ludden.htm](http://www.frontiersjournal.com/issues/vol6/vol6-01_Ludden.htm)>

註<sup>⑪</sup> Robert H. Bates, "Area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Rupture and Possible Synthesis," *Africa Today*, Vol. 44, No. 2 (1997), pp. 123-131.

註<sup>⑫</sup> Nicholas B. Dirks, "South Asian Studies: Futures Past,"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rticle 9, 2003,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

構內的重要部門。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社會對於南亞關注的提升，以及第三部門對於南亞專業知識需求的增加，也使得南亞研究者得以在狹窄的學院體制和分科之外，尋得另一個重要的棲身之所，更因此避免來自學界的成規和壓力；<sup>83</sup>但這種外在於學院體制的轉變，似乎尚未能轉化為學院體制內部的南亞研究動力；事實上，現今在學院體制之內推動南亞研究最重要的力量，無疑與以下另外二個現象有關。

第二個現象，就是美國印度移民社群對於南亞研究的重視，這種重視也成為現今學院體制設置和教授南亞相關課程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之一。誠如前述，進入後冷戰和全球化時期，不僅聯邦和民間基金對於區域研究的態度始終舉棋不定，學院內部也開始更加從成本角度思考課程設置的必要性，並傾向將資金轉而挹注到分科之中，而這對於區域研究來說，特別是原本即位處邊緣位置的南亞研究，更是一項沈重的打擊。

最近幾年中，或許美國學院南亞研究最大的轉變，不是學者之間越來越多的知識交換與合作，而是越來越多南亞語言、文明和區域研究課程的學生擁有南亞背景，而這些美籍南亞裔學生則大多是早期南亞移民社群的後裔（特別是在 1965 年移民法案修正之後進入美國）；現今南亞研究課程能夠繼續在美國學院體制中維持地位（例如：順利保住大學對於印地語（Hindi）和烏都（Urdu）的贊助），美國南亞移民社群的贊助乃至為關鍵；這些移民的後裔渴望透過課堂認識自身的傳統，並看到南亞的新興風貌。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種需求的推波助瀾之下，更多的現代議題也開始被納入南亞研究之中，讓傳統限於哲學、宗教領域的南亞研究更加多元（像是電影、音樂、藝術、大眾文化等等議題）；另一方面，這種轉變也促使過去多聚焦研究生課程的南亞研究，逐漸轉而重視大學生課程的教授。

然而美國南亞移民社群的贊助雖然為南亞研究帶來生機，但也同樣引起一些問題。例如：由於來自印度的贊助往往比其他南亞國家多，再加上原本南亞研究便比較偏重印度，遂使得在大學課程中，不僅偏重印度研究，也比較偏重印度教研究；儘管二個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國家也在南亞，但似乎只有在政治領域，巴基斯坦較受關注（因其政治局勢不穩定），孟加拉則因為貧窮，而受到發展經濟學關注；至於，斯里蘭卡和尼泊爾則是人類學研究的重鎮；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南亞研究課程的聽眾幾乎都是美國或非南亞裔的學生；但在今日，南亞社群內部的緊張關係（例如：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與斯里蘭卡、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得認同問題也將成為南亞課程教授中的一項重要挑戰。

第三個現象，則是印度經濟的迅速崛起，使得公眾對於印度知識的需求大幅增加，特別是在高盛投資銀行（Goldman Sachs investment bank）研究報告在 2003 年提出「金磚四國」（BRICs）的概念之後。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從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逐漸轉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印度，在 IT 產業領導之下，經濟開始迅速成長。短短十幾年之間，已經使得印度在商業領域的討論中位居要位；在過去，印度的經貿情況從

---

註<sup>83</sup> Alyssa Ayres, "Beyond Disciplines: Indi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30.



來就不是南亞研究的重要議題，但現今卻成爲報章、雜誌或媒體中，最常見的南亞議題。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這種對於南亞研究推動力量甚至更勝冷戰戰略需求。許多商業人士已經指出，對於印度（或南亞）區域和文化的必要理解，將成爲企業是否能夠成功打進這個陌生市場的最重要關鍵；<sup>84</sup>事實上，像是許多大學的知名商學院（像是賓大的華頓（Wharton）、哈佛、史丹佛、西北大的凱洛格（Kellogg）、印第安那大的凱利（Kelley）等等），便已經推出一系列南亞課程，甚至實地考察印度的行程。我們可以看到，相較於同樣掌控學院中大量資金主導權的其它職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s）（像是法學院或醫學院）對於區域研究的不友善態度，長期以來，商學院（business schools）反而比較有意願讓學生接受區域語言和知識的訓練（不僅許多商學院學生皆曾受惠佛布萊特計畫，像是賓大更會將聯邦基金分配給華頓商學院中專門運用區域研究訓練國際商業幹部的課程）。

在這種商業熱潮之下，究竟將會對於南亞研究產生何種影響？儘管現在具體影響情況尚未明朗，但我們卻可以清楚看到，對於現代南亞溝通語言訓練（著重口語對話而非經典考察），以及實用社會與文化知識的需求，在濃厚的商業目的性考量之下，似乎已經成爲這一股潮流對於南亞研究首當其衝的影響；事實上，可以預期的是，這種側重於商業和實用面向的影響，將促使南亞研究更加著重於當代政經議題的討論（特別是在大學生課程當中），因爲對於一位商業人士來說，後現代和文化理論的討論，或是歷史和文學的課程，似乎對於商業經營並無直接的關連性。

嚴格來說，區域研究興起之後，南亞研究便始終佔據邊緣化的位置；最重要的「霸權地區」，始終聚焦西歐與蘇聯；日本、中國、韓國，也佔據「亞洲研究」（Asian studies）焦點，南亞研究則始終位於高教的邊緣位置。上述三個現象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提升了南亞研究在社會和學院中的有利位置，但我們卻不能將這種趨勢過度放大解讀；事實上，上述三個現象並未根本改變南亞研究在整個美國社會和學院體制中的地位。我們可以透過「現代語言協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針對全美國大學外語課程選課人數所進行的調查結果，作爲考察南亞課程熱門程度的參考指標；<sup>85</sup>在這份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2002年印地語和烏都修課人數增加，但西班牙語還是最多，第二則是法語，第三是德語，第四是義大利語，第五是美國手語，接下來，分別是日語和漢語、拉丁語、俄語、古代希臘語、聖經希伯來語、阿拉伯語、葡萄牙語、韓語；所有南亞語言修課總人數，竟然還不到韓語的一半；更重要的是，除了透過宗教研究課程提供宗教經典語言訓練之外，目前美國也僅有少數機構能夠提供現代南亞語言的訓練課程。換句話說，一般學生只能透過少數大學所開設的比較文學或南亞研究課程間接接觸，遠比不上現今學習東亞語言的多元管道。這種情

註<sup>84</sup> C. K. Prahlad,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 (Upper Saddle River, NJ: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2005) .

註<sup>85</sup> 這是一項由「現代語言協會」與「外語系協會」（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s of Foreign Languages）代表美國教育部所執行的調查，也是目前對於美國外語課程最重要的全面調查；轉引自 Alyssa Ayres, "Beyond Disciplines: Indi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3~34.

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分說明了，儘管在後冷戰與全球化時代，南亞研究持續獲得生機，但其依然處於一個相對弱勢的地位。

## 伍、他山之石：南亞研究在台灣的發展願景

根據上文針對美國學院體制中南亞研究發展、挑戰與現況的描繪，我們可以看到，南亞研究作為區域研究一個重要分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民間資金的投入而迅速興起，並在官方資金的大量挹注之下，成為學院中的重要體制和研究領域；唯相較其它區域研究分支偏重於政經議題討論的傾向，承襲印度學知識傳統的南亞研究，在研究傾向上仍然側重於語言、宗教、哲學或等等議題的討論，不僅具有濃厚的「古典主義」色彩，在賓大與芝大領銜之下，也融合人類學與文化研究取徑，孕育出其特殊的研究風貌。如何正確再現並理解南亞，始終都是每一位南亞研究者共同關注的課題。隨著南亞研究跨學科色彩的日益加重，多元且有別於傳統研究取徑的嘗試也逐漸出現，而南亞研究在其制度性和知識性的發展過程中，也不斷遭受內部和外部的嚴峻挑戰。無論是後殖民的解構觀點，或學院分科體制的質疑與排擠，還是後冷戰和全球化時代對於全球知識的期待，在一方面雖然帶給了南亞研究更強烈的挑戰，但另一方面卻也提供其嶄新的發展契機。

整體而言，本文認為，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知識與商業需求，或許能夠讓我們以樂觀的態度期許南亞研究的未來，但不可諱言的是，民間（無論來自基金會、非政府組織或南亞移民社群）和政府（包括聯邦與地方政府，以及來自南亞諸國的贊助）對於南亞研究的奧援，仍將是南亞研究能否繼續存立於美國學院體制中的關鍵因素；儘管「金磚四國」風潮的崛起，讓印度和南亞次大陸擄獲不少公眾目光，成為一個有利學院體制內部南亞研究發展的外部環境因素，但若欲在未來獲得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則現今南亞研究似乎仍亟待解決幾個重要的發展議題，讓其研究成果的獨特性與重要性，能夠更廣泛地受到學界和社會肯定。

綜合前述，我們可以看到，現今美國南亞研究面臨的重要發展議題，大體上可分為制度性與知識性二個面向。就制度性面向而言，首先，由於聯邦基金奧援的動向不明，加上學院內部對於研究經費的刪減或轉移，使得南亞研究普遍必須面對籌措財源的難題；其次，面對分科勢力夾擊與「學院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的學院生態，<sup>88</sup>致力於跨學科整合並具有濃厚古典主義色彩的南亞研究，也往往容易被貼上定位不明或缺乏實效的標籤。其結果不僅繼續惡化既有經費困境，也促使學院內部形成

註<sup>88</sup> 「學院資本主義」的概念被用來形容現今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內部的商業競爭文化。在「學院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不僅知識成為一種可以被隨時取得的定型化商品，創造與開拓外部資源的能力，也成為衡量學術部門生產力的最重要標準。無法創造與開拓外部資源的單位，便被學校認為是提升競爭力的阻礙；參見 Gary Rhoades, "Capitalism, Academic Style and Shared Governance," *Academe*, Vol. 91, No. 3 (2005), pp. 38-42；可以預期的是，受到「學院資本主義」生態影響，需要長期關注投入而未必能產生實效的研究（像是許多人文研究），便往往被認為是缺乏投資效益的研究領域，而經常成為學院縮減研究經費的第一個對象。

不利於南亞研究者的各項評鑑標準（無論是升等或計畫准核），迫使研究者無法堅持其南亞研究主題；再者，囿於上述學術環境對於研究者發展、晉升和謀職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跨學科學術訓練的沈重負擔（特別是深受印度學影響的南亞研究，格外重視研究者在語言、文化和歷史方面的訓練），也使得許多學生或研究者卻步，從而產生潛在研究人才斷層的危機。

另一方面，就知識性面向而言，首先，面對一系列來自東方主義、屬民研究與文化批判的反省，承襲濃厚印度學傳統的南亞研究，必須更嚴格地檢視其研究所立基的各種假定，同時明確地說明其回應這些觀點的基本立場；其次，為了更強有力地迎戰分科挑戰，如何有效透過南亞研究組織的領導與統整，將各自為政的研究成果相互積累與融貫，逐步在更廣泛的基礎之上，確立南亞研究的跨學科理論典範和研究紀律，也將成為突顯南亞研究自身獨特性與重要性的關鍵工作；最後，如何通過謹慎定位南亞研究與全球知識之間的關係，回應學界對於全球化議題的熱衷與期待，也將成為南亞研究無法迴避的重要知識性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制度性與知識性議題乃彼此環環相扣，因為若無法澄清南亞研究在知識上的爭議，突顯其研究議題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則勢將加深其在學院體制中的困境；反之，南亞研究在制度上所遭遇的困境，也不斷在南亞研究者尋求知識突破的道路上形成阻礙。在此種現況之下，本文認為，如何擺脫對於聯邦基金的過份依賴，轉而向民間單位積極尋求經費奧援，似乎是跨越上述困境的關鍵第一步。畢竟穩定的經費奧援，對於已經位居邊緣的美國南亞研究來說，毋寧更是解決其它制度性與知識性議題的先決條件。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知識性和制度性議題，不僅存在於美國學院體制之內，也勢將成為未來南亞研究在台灣逐步開展時難以迴避的關鍵議題；事實上，若無法釐清並闡明南亞研究在知識上存在的爭議性，突顯其研究取徑和議題上的獨特性與重要性，進而適時回應來自各分科的可能攻訐，南亞研究依然很難在台灣取得真正立足之地。當然正如上述美國經驗所示，此種知識上的爭議也勢將進一步加深南亞研究在台灣學院體制中的困境；儘管在許多學術與政治環境上，台灣不能與美國發展經驗一概而論，但整體而言，美國南亞研究發展遭遇的諸項知識性與制度性議題，仍殊值台灣加以對照和參考，此毋寧亦是本文借鏡美國經驗背後的一項重要意旨。

在此意旨之下，透過借鏡上文對於南亞研究在美國學院發展經驗的論析，在下文的研討中，本文便將把目光聚焦於南亞研究在台灣發展的現況和願景之上，針對其可能面對的重要知識性與制度性問題和困境，提出進一步地省思與建議。首先，針對來自於知識性的考驗，本文認為，如何清楚闡釋台灣從事南亞研究的宗旨與利基，並突顯其可以為台灣帶來的重要貢獻性，乃係進一步爭取學界認同與制度性發展空間的基礎。在此一部分中，本文將試從知識性和實用性二個層面申論說明；其次，針對來自於制度性的考驗，本文則認為，在極度缺乏經費奧援的大環境之下，如何立足於現況之上擬定適當階段性發展目標與策略，則係當前在台灣推展南亞研究時的首要任務。在結論部分中，本文便將據此制度性考量，針對未來台灣南亞研究分期發展階段，提供一個可能的藍圖規劃。

相較南亞研究在美國所遭遇的知識性議題，本文認為，當前南亞研究在台灣開展，也同樣存在幾項亟欲加以回應的課題：第一、面對分科夾擊區域研究的整體學術生態，以及台灣社會看待區域問題的短淺功利心態，如何清楚定位南亞研究與各分科之間的關係，突顯南亞研究的獨特性與重要性，以及台灣社會對於南亞研究的需求性，便成為未來台灣南亞研究論者必須回應的第一項重要挑戰；第二、正如同傳承濃厚「古典主義」色彩的美國南亞研究，未來台灣南亞研究也很可能在「融會」（而非「取代」）傳統取徑的研究成果之上加以開展，如何釐清或批判傳統取徑可能蘊含的偏頗假定和扭曲想像，則成為台灣南亞研究論者實際從事研究之際必須注意的另一項重要工作；第三、鑑於全球化帶給區域研究發展的複雜影響，以及在此趨勢之下出現的全新學術生態與分工，全球化也勢將成為未來台灣南亞研究不可迴避的一項重要挑戰。當然，在進一步針對此處三項課題試析本文觀點之前，我們實有必要先瞭解一下當前南亞問題在台灣學界中的主流研究議題和取徑，以及其潛在的侷限性，從而提供一個擊劃台灣南亞研究願景時的基本議題背景。

嚴格來說，近幾十年來，儘管國內各學術領域內並不缺乏關注相關南亞問題的研究人士，但基本上其研究視野和對話議題仍多侷限於各分科領域之內，缺乏跨學科的整合觀點，距離真正透過區域研究視野強調科際整合的南亞研究，其實仍存在一段很大的距離；相較上述美國南亞研究卓然有成的多元研究風貌，以及國內成果較為豐碩的其它區域研究領域，環顧目前南亞研究在台灣的發展現況，實仍屬起步與摸索階段。南亞問題對於國內學界而言，不僅尚屬較為陌生的研究領域，缺乏研究者系統性和持續性的投入關注，同時也缺乏向國際主流研究對話的企圖；不唯如此，在研究主題分佈上也仍然較偏重於相關人文學領域。因此，在研究屬性上，其實比較類似前述深受語言文獻學影響的印度學研究傳統，而非作為區域研究一門分支的南亞研究；有所不同的是，相較上承古典東方學、下開近代南亞研究的歐美印度學，目前台灣人文學界對南亞宗教、哲學、語言（例如：梵文與巴利文這些經典語言）的關注，<sup>註⑧</sup>乃多係

註⑧ 囿於篇幅之限，本文在此無法全幅蒐羅與檢討所有國內對於南亞問題的研究主題，但大致上還是可以觀察到幾個較受關注的研究主題，包括：第一、相關人文研究主題：誠如內文所述，在傳統佛學研究影響之下，相關的宗教、哲學、語言、文學等領域，都是較受關注的研究主題；唯目前國內對於南亞宗教的理解，多集中於佛教與其經典、義理和文字的考察之上；儘管這類研究起源甚早，但其關注焦點卻過於狹隘（反而忽略了真正主宰南亞宗教生活的印度教傳統），而其傳統研究主題、方法與路徑，也亟待從印度學或南亞研究的視角進行更深刻的反省；第二、相關藝術主題：包括建築、繪畫、音樂、舞蹈等等主題，雖然範圍甚廣，但多半仍圍繞在佛教傳統；這類研究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便在於缺乏研究的整體性與延續性，相關研究往往來自研究者個人的業餘興趣；第三、相關政經主題的社會科學研究：關注的視角可以分為二個方向，其中一個關注於南亞的經貿發展，這主要是受到「金磚」風潮的吸引而出現，但其探究焦點卻未及於印度之外的其它南亞國家，呈現方式也多為官方報告或金融報導，商業或政策的重要性似乎遠高於其學術參考價值；唯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印度屬於聯邦制，各邦法規與經貿狀況各異，加上第一手資料取得不易，因此相關探究也多停留在「鉅觀」層次的概述（多半只是國外報告或報導的轉譯），無法提出比較「微觀」層次的分析；另一個則是從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的視角，關注印巴關係、核武問題、南亞戰略形勢等等主題，但仍偏重於從戰略角度提出分析，並太過倚賴中國方面對於南亞的研究觀點（儘管早年吳俊才和沈鈞博曾致力於研究印度歷史和國內政治，但後來卻缺乏後進加以延續）。大體而言，研究主題仍大多分佈在第一種類型（從國內已經舉行的前後三屆台灣「印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類型加以觀察，情況也符合這裡的說明），但相關研究不僅仍顯零散，而且彼此無法對話，更欠缺持續性與累積性。

延伸自固有佛學研究傳統（相關學術課程亦多開設於人文系所或其它民間的宗教機構之中），既非傳承東方學的結果，也尚未為南亞研究開啓足夠能量。

職是之故，儘管同以南亞作為研究對象，但現階段國內人文學界對南亞問題自成一格的主流探究模式，無論是在問題意識、研究途徑、理論取向上，其實也很難與西方印度學研究傳統完全劃上等號，<sup>88</sup>當然更遑論比附強調跨科際整合的現代（南亞）區域研究；唯須加以適時陳明的是，本文在此描繪此種研究趨勢和現況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貶抑這類近似印度學傳統的研究成果，也不在於暗示透過區域研究視野處理南亞議題，更具有任何先驗的知識優越性；相反的，如何運用現有研究利基進一步推動南亞研究在台灣的發展，並突顯其區域研究視野的跨學科特性，毋寧才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本文認為，儘管目前散佈各人文分科並偏重南亞宗教、哲學、語言的研究，確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我們更可以選擇通過科際整合的區域研究視野，融會並延伸這類研究的貢獻能量。

在此現況之下，我們可以進一步針對上述第一項課題提出回應。本文認為，當前論者在力倡台灣南亞研究之際，為了強化其接受度，除了必須突顯南亞研究迥異於傳統南亞問題探究取徑之處，更必須清楚說明南亞研究可以為台灣社會和學界分科帶來的貢獻；申言之，當論者期待突破既有類似印度學傳統的研究框架之際，像是「究竟台灣為什麼需要南亞研究？」「南亞研究能為台灣帶來什麼樣的貢獻？」或「南亞研究是否有獨立於各分科之外的必要性？」這類問題，更是我們必須審慎回應的論題。

事實上，當我們提出這些問題時，便如同我們在回答：「為什麼需要東南亞研究？」或「為什麼需要中國研究？」這類問題一樣，一種最常見的答覆模式，便係從實用性或功能性的需求作為訴求點；然而，誠如前述美國經驗所示，儘管南亞研究在美國的開展，具有一定實用性或戰略上的動機，但美國南亞研究創建者從發展伊始便已深知，非應用性或基礎性學術知識的累積工作，同樣也是紮實的區域研究不可偏廢的要務。換句話說，儘管在政經戰略上的貢獻度最容易迅速彰顯區域研究的重要性，但語言、歷史和文化這類非應用性或基礎性學術知識的奠基，才是整個區域研究視野能否真正兼具深度和廣度的決定因素；更重要的是，當南亞研究在美國漸次發展成熟並延伸其影響力至各分科之後，其在知識上所提供的卓越貢獻，甚至早已掩蓋各方最初對其在實用性上的期待。

從前文的描繪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伴隨質量兼具並深具批判力道的南亞研究相繼出現，跨學科觀點、方法和視野的不斷援引與多元嘗試，不僅徹底顛覆傳統東方學和印度學對南亞世界的理解框架和限制，也為後殖民批判和文化研究帶來極豐沛的研究元素；與此同時，透過跨學科視野的運用，南亞研究也在知識上為傳統學院分工帶來獨特的貢獻與衝擊。南亞研究所提供的觀點與例證，不僅經常成為各分科鉅

註<sup>88</sup> 近幾年中，面對此種發展現況，不少國內人文學研究者開始倡議印度學的研究典範，企圖讓過去失焦、零散並深受佛學研究影響的南亞宗教、哲學、語言議題討論，能夠借鏡西方印度學的架構重新聚焦，例如：前述台灣「印度學學術研討會」便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努力工作。

型理論之「異例」(anomaly)，也為囿於專業語言而相互扞格的不同分科，提供一個對話與聯繫的舞台。

本文認為，上述南亞研究在知識上所作出的一系列研究貢獻，並非美國知識界的專利，面臨類似處境的台灣知識界也同樣能夠從中獲益。不可諱言的是，長期以來，在歐美學術霸權的主導之下，各分科一味套用西方鉅型理論的現況，不僅經常惹來「學術代工」之譏，也使得台灣學界始終很難向國際主流研究議題發聲。在這一方面，經常為鉅型理論提供顛覆性觀點的南亞研究（其它區域研究亦復如此），不啻可扮演一個調節角色，透過南亞諸國的異文化（或異例）現象，提供分科研究者更寬廣的視角，助其從迥異於西方鉅型理論的角度重新思考自身分科內部的研究問題。除此之外，在台灣知識界日益熱衷於一系列「後學」思潮之際，傳承特殊古老文明並經歷尖銳殖民與後殖民衝突的南亞社會，無疑也可以作為許多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參照；<sup>⑧</sup>事實上，由於南亞社會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所展現出來的特殊風貌，早已吸引許多歐美現代性研究者紛紛投入南亞研究的行伍之中；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透過專業和獨立南亞研究的開展，也將有助深化其它既有區域研究領域的視野與成果。例如：由於南亞與鄰近區域（中亞、東亞與東南亞）的密切聯繫（從宗教、文化、族群、社會結構到熱門的政經發展互動），也勢將使得對於南亞相關議題的掌握成為理解整體亞太問題時不可切割的重要部分。

立基此種知識上的關懷，本文對於南亞研究在台灣的發展，同樣也抱持一個積極肯定的立場，並期待通過科際整合的區域研究視野，增益現有台灣學界對於南亞問題的研究成果，凝聚與整合更多潛在的分科研究人士。當然，在知識層面的考量之外，本文更認為，實用層面的考量無疑也是促使今日台灣亟需開展獨立南亞研究領域並突破傳統研究窠臼的另一個重要理由。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由於過往國內區域研究工作的推展，始終深受政府外交政策方針的影響，在南亞尚未成為外交重點工作對象之際，南亞研究自然也難以獲得足夠的關注，經常被籠統納入既有的亞太或東南亞區域研究範疇之內。<sup>⑨</sup>然而，正如同二戰之後的冷戰對峙局勢讓南亞研究開始獲得矚目眼光，「金磚四國」熱潮的出現，也

---

註<sup>⑧</sup> 本文認為，像是前述在歐美學界造成廣大迴響的「屬民研究」，以及其對於主流「歷史敘述」的解構與重構，便非常值得當前深受政治動機與菁英觀點影響的台灣歷史重構工作借鏡。以印度為例，今日其國內史觀也深受二種勢力影響：一種是從「(印度教)民族主義」觀點出發的本地菁英史觀（主要由印度人民黨代表），另一種是從「殖民主義」觀點出發的西化菁英史觀（主要由國大黨代表）；然而「屬民研究」卻致力從底層挖掘截然不同的觀點，企圖突破這二種菁英式史觀的框架並突顯其虛妄性。這種努力不僅在知識界獲得極大的迴響，也促使上述二種深受政黨對立氣氛影響的史觀，必須針對「屬民研究」的觀點加以回應，從而讓原本二相壁壘分明的史觀論點提供一個對話的機會。

註<sup>⑨</sup> 相較於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由於南亞地區長期作為其政府外交工作的重點項目，也因此，在刻意的學術分工和政策指派之下，已經累積不少質量可觀的南亞研究成果。目前南亞研究除了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重點工作項目之外，包括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雲南社會科學院等等，都設有相關南亞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此外，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南亞學會與北京大學出版的南亞研究 (*South Asian Studies*) 期刊，以及由四川大學出版南亞研究季刊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期刊，則為華文世界中的南亞研究提供重要的學術發表平台。

為南亞研究在台灣的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機。近年來，隨著印度令人驚豔的卓越經濟表現，印度（其它南亞國家則未受到同等關注）在一時之間，也躍身成為台灣財經討論的熱門議題，政府更開始積極籌畫相關計畫與措施；<sup>①</sup>但不可諱言的是，受到「金磚」一詞吸引，台灣輿論各界似乎才首次意識到原來在中國之外，還存在一個具有高度發展潛質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在台灣以經貿心態掛帥的印度獵奇之旅中，目光仍僅聚焦於印度飛漲的證券指數，尚未瞭解到認識其整體區域問題的重要性。在台灣一片樂觀的金磚趨勢預期中，印度與其周邊區域本身面臨的各項嚴峻考驗（像是潛在的政治對立氣氛、宗教社群問題、種姓社會結構瓦解、傳統與現代觀念衝突、社會暴力循環等內部議題；或印巴核武問題、印度區域霸權崛起、全球反恐戰略中的印度定位等外部議題），也幾乎從未國內輿論受到認真而仔細的對待（遑論其它涵蓋甚廣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議題）；<sup>②</sup>然而，對於這一系列廣泛而基礎問題的深入理解，卻是實用性政策規劃和經貿戰略的重要基礎。彼時美國也正因此一考量，致力通過區域研究的跨學科視野切入南亞問題的討論，此點自然也殊值今日侷限於狹隘經貿認識心態的台灣參考借鏡。

不唯如此，本文更認為，現今以自由、多元、開放氛圍自詡的台灣社會，在積極思考投身國際社會之際，自身也必須培養分析和處理不同文化和國際議題的基本能力，套用一句淺白的話來說：「如果我們根本不識他人！如何能要求他人肯定我們呢？」誠如前述，美國其實也是在驚覺其社會極度欠缺回應新興世界局勢的基本能力之際，才積極孕生今日所見之區域研究。故其不僅希望能讓政策分析或外交方針能夠立即從區域研究的成果中獲益，更希望透過區域研究在菁英（大學）教育中的紮根工作，讓經常自滿於狹隘地域觀點的美國社會開放視野。本文也認為，這種將區域研究視作一種社會教育媒介的實用性考量，其實也正是另一個台灣為何必須強化南亞研究（其它區域研究亦復如此）的重要理由，特別是在台灣著重於專業而非通識課程的高教現況之下，對於一般大學生而言（除了若干專業系所之外），不僅國際議題涉獵甚少，觀點也過度偏重美國和日本，更缺乏對於不同文明或區域的基本認識（以及附隨其上的包容和尊重）。<sup>③</sup>

註① 例如：1995年台灣與印度雙方互設代表處之後，相隔十年，2006年2月11日，台灣官方也推動成立「台灣印度協會」，企圖協助台印雙方在經貿、學術、文化及其他項目的全方位交流，作為「新南向計畫」的重要措施之一。

註② 在這裡，我們僅略舉印度為例加以說明而已，像是其它尚無法列名「金磚」的南亞諸國，自然更難受到應有的重視。

註③ 嚴格來說，這種缺乏基本認識的情況，非僅止於一般大學生而已，對於很多台灣不同領域內的研究者來說，情況也常係如此。我們必須深切體認到，儘管台灣內部存在許多值得關切的重要研究議題，但從知識追求與學術探究的角度考量，台灣學術研究者（特別是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的關懷視野卻不能僅侷限於本島之內，而忽略全面認識不同文化、文明和區域的重要性。在這種意義之下，本文認為，區域研究同樣可以充作一種知識媒介，作為相關研究者在認識不同文化、文明與區域時的重要背景參照；另一方面，在台灣學界不斷倡言「學術國際化」的今天，儘管「能否運用國際語言發表學術成果」儼然已經成為衡量「學術國際化」的唯一指標，但其實研究者「能否向國際學術議題進行對話並提出自身觀點」，毋寧也應該成為衡量台灣「學術國際化」實質表現的另一項重要指標。

唯須注意的是，儘管透過上述知識和實用層面的討論，本文肯定南亞研究在台灣開展的重要性與貢獻性，以及傳統研究取徑融會南亞研究的可能性，但並非意味未來台灣南亞研究也必須完全仿效美國南亞研究模式與議題取向。事實上，本文借鏡美國經驗的主要目的，並非意欲暗示美國模式的優越性，也不希望台灣南亞研究一陳不變地仿效或套用美國模式，畢竟南亞研究在美國的發展有其特殊歷史背景，而彼此的高教研究和教學環境也有所不同。職是之故，台灣當然可以衡情度勢尋找最能夠突顯自身發展特色的南亞研究（例如：配合全球學術分工，尋找最有利自身的研究定位；詳見後述）。在此援引美國經驗的初衷，毋寧只是希望藉此說明南亞研究在發展上所可能遭遇的一些基本困境，因為這些困境不僅存在於美國，也勢將影響未來台灣南亞研究發展的基本格局。

次而，針對上述第二項課題而言，誠如前述，儘管目前國內對於南亞問題的討論仍偏重傳統取向並深受佛學研究影響，但正如前述賓大教授布朗在擘劃現代南亞研究格局時的初衷，本文也同樣相信，既有國內傳統研究成果仍能成為未來台灣南亞研究一個有利的出發點，而未來南亞研究也將能回過頭來延伸並互補於傳統研究的積累成果；唯值得注意的是，在承襲與融會傳統研究成果之際，台灣的南亞研究者也必須透過更具批判性的立場，重新審視當中可能蘊含的偏頗假定和扭曲想像；事實上，很明顯可以看到，面對一系列東方主義、屬民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反省，現階段國內關於南亞宗教、哲學、語言的傳統研究，由於欠缺國際交流與對話，似乎仍存在許多強化反省力道的空間。基此，未來台灣南亞研究者在實際融會傳統研究成果時，自然也必須抱持更為謹慎的態度。<sup>④</sup>

最後，針對上述第三項課題而言，本文認為，儘管對於後冷戰全球化時代與全球知識的各種殷切期盼，使得不少論者對於區域研究的未來抱持悲觀的看法，但正如前述所言，這種論調不僅過度簡化區域研究的複雜發展歷程與內涵，似乎也體現一種完全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想像；事實上，全球化不僅沒有瓦解區域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依賴其跨學科與脈絡性的研究視野為全球化之下的新現象提出極具貢獻的描述與解釋，甚至作為一種對比於全球主義的觀點；不唯如此，受惠於全球化和傳播科技的大幅提升（研究訊息和資料的日益透明並易於分享、傳播和載錄），不僅使得全球性學術社群和學術分工成為可能，區域研究也因此逐漸跳脫過往以美國為中心的發展格局：透過更廣泛的全球參與（包括來源更廣的研究人員、視野和資料），一方面促使美國區域研究社群必須重新以更多元的角度看待區域問題，二方面也讓區域研究有機會為美國霸權觀點提供另一種學術聲音；儘管在可見的將來，以美國知識界為首的南亞研究，仍將在全球南亞研究社群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與此同時，在全球網路之下，她們的觀點將不再是單一的、單向的、宰制的，來自不同地區的南亞研究成果，也將扮

註④ 例如：由於缺乏實地調查研究並受到佛學經典影響，過往國內學界經常將「種姓制度」（caste system）想像成一種形同「靜態」的社會結構，忽略「種姓制度」在微觀層面上的巨大差異性，而這也使得許多引用其觀點的後續研究，同樣誤植於此種扭曲的想像概念之上。



演不同的批判角色，提供更多元的聲音。

在此基礎之上，我們不啻也可以從一個角度窺見台灣孕生南亞研究的契機：全球化不僅讓台灣南亞研究的孕生更具其知識上的意義，全球化所造就的全球性學術社群和學術分工也提供台灣南亞研究發展諸多利基。就前者而言，我們可以看到，長期以來，由於位居西方第一世界的話語中心，使得美國領銜的南亞研究，經常成為學術霸權的表徵，淪為後殖民與文化研究攻訐的對象，但從台灣的角度向主流南亞研究議題發聲，卻可以提供一種非西方主流的觀點，體現學術對話上的意義，並進而豐富全球南亞研究社群的多元視野；就後者而言，儘管美國仍執當前南亞研究牛耳，但由於全球化和傳播科技的大幅提升，也確實大幅加速南亞研究社群的全球化腳步，不僅讓其它各國南亞研究單位得以透過研究資源的分享（例如：學術資料庫與網站資源平台的建立）急起直追，也使得跨國研究合作和分工計畫（無論是研究人員、地點、資源、經費或主題的分工）相繼出現；在此趨勢之下，全球化對於現今尚在起步階段的台灣南亞研究來說，不啻也可以提供許多研究累積上的裨益，特別是在現今嚴重缺乏研究經費奧援和基礎資料的環境之下，透過置身南亞研究的全球網絡之中，一方面可以因此得到許多重要的研究訊息與資料，二方面也可以透過參與跨國研究合作，或承接特定學術分工任務，從中深化南亞研究學科主流研究議題，獲致寶貴的研究資料與經驗。

透過前揭三項關乎台灣南亞研究發展重要議題的說明，我們不難發現，儘管可能面對各方來自於知識上的挑戰，但若能有效整合現有學界資源和力量，循序漸進建立台灣南亞研究的學術定位與紀律，本文對於台灣南亞研究的良性發展，還是抱持一個審慎樂觀的態度；唯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南亞研究在台灣所經歷的挑戰，卻並非僅止於前揭三項偏重於知識性的挑戰而已。正如同制度性因素始終位居美國南亞研究發展過程中的顯著地位，南亞研究在台灣也同樣必須面對多項嚴苛的制度性挑戰。如何合宜面對此類制度性挑戰，在現況之下尋找可能的發展策略，也勢將影響台灣南亞研究因應前揭三項議題的能力與時程。職是之故，在以下的結論部分中，本文便將扼要說明這類制度性困境，進而針對未來台灣南亞研究分期發展階段，提供一個可能的藍圖規劃。

## 陸、結 語

透過上文對於美國南亞研究發展經驗的描述，我們也不難發現到，儘管前後歷經將近六十年的發展（近年間也出現許多有利於發展的環境因素），並從知識和實用層面作出卓越的貢獻，唯南亞研究（其他區域研究亦復如此）卻由於各方對於區域知識的各類質疑仍未消褪，加上身處於瀾漫前述「學院資本主義」氣氛的分科體制中，同時受到流行的全球知識憧憬圍繞，使其迄今仍在疲於應付各類攻訐與競爭，艱困地爭取極為有限的制度性奧援；事實上，在此趨勢之下，美國南亞研究便經常必須面臨「三

缺」(缺錢：缺乏研究經費奧援；缺權：缺乏適切評量研究者貢獻的學術評鑑標準；缺人：跨學科訓練負擔沉重，再加上前述二項因素，造成研究人才流失)危機。

本文認為，對於台灣南亞研究來說，這種「三缺」危機可能更為明顯，特別是由於台灣根本欠缺二戰後期美國孕生南亞研究的社會背景，以及類似聯邦基金的大量經費援助政策；參照美國南亞研究的發展經驗，我們也不難預期，姑不論獨立南亞系所或研究中心未來有無設置的可能，或適切的學術評量標準有無可能發揮獎勵南亞研究的效果，現今僅僅談到研究經費此一議題，便已能讓許多費心思量台灣南亞研究前景的人士不禁大嘆不如歸去了！儘管如此，面對重重制度性困境，本文還是不願抱持完全悲觀的立場，並希望從積極正面的角度，嘗試立基於當前困境之上，擘劃未來台灣南亞研究發展的分期藍圖，期能喚起更多學界、政府和民間的重視。

然而，在一系列可能面對的制度性考驗中，本文認為，對於尚在起步與摸索階段的台灣南亞研究而言，經費奧援則可謂其中至為關鍵的一項課題；不僅因為許多其它的制度性瓶頸其實皆根源自此一經費困境(例如：缺乏經費補助，不僅導致研究人才不願投入)，更因為許多重要和基礎研究工作的開展，著實也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例如：田野或調查研究工作的進行)。職是之故，如何爭取並擴展穩定與可行的經費來源，便成為未來台灣南亞研究發展因應各項制度性考驗的重要「前」提與「錢」題。

參照前述美國南亞研究發展經驗，我們不難看到，政府聯邦基金與民間基金會的大量經費挹注，無疑在其發展階段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儘管今日在全球化與「金磚四國」的熱潮之下，民間經費來源的比重可能將取代政府聯邦基金的挹注(美國南亞研究社群也希望逐漸藉此擺脫對於政府聯邦基金的過份依賴)；相較之下，政府和非政府單位的重視與資助，不啻亦為台灣南亞研究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力量；或許，一如中國崛起為中國研究帶來的龐大利基，近年印度經濟發展的熱潮真能為南亞研究提供樂觀的「錢」景，唯姑不論此種商機能否轉化為對於學術研究的挹注，亦不論其關注焦點能否擺脫狹隘經濟議題並包含整個南亞地區，僅就當前台灣極難向民間爭取經費的社會現況而言，本文仍然傾向認為，爭取來自政府經費，對於當前可能依循「小而美」發展基調的台灣南亞研究來說，毋寧還是一個比較穩定與可行的籌源策略。

不過除了積極尋求經費奧援之外，如何整合現階段分散各研究領域內的南亞研究社群成員力量，也是另一個當務之急。申言之，如何釐清國內整個南亞研究的全貌與體系，讓全體研究成員能真正認識南亞研究的研究紀律、典範與分工，以及南亞研究知識發展的脈絡，進而體認到自身在此一研究社群中的確切位置，從而貢獻彼此研究的成果，使相關研究能夠相互整合與對話、延續和積累，便是未來規劃南亞研究發展方向的首要工作之一。

在有限的時間、人力與資源之下，為了達成上述目標。本文建議，可以設定三個分期目標：在初期，可以成立一個類似「美國印度研究學會」的研究組織，協助橫向聯繫研究社群成員，強化研究資訊的分享與交換(嘗試建立研究資料庫與研究目錄，作為未來國內外學術社群進一步對話與互動的重要平台，從而尋找台灣從事南亞研究的立基點)。透過該研究組織出具名義或作為代表，也可提供南亞研究社群成員另一個

向多方爭取經費的重要渠道。此一時期，各領域學者將先延續並深化各自在其研究領域上的關懷，期能充分體現南亞研究跨學科和多元取材的特色；在中期，則希望結合學者之力（例如：透過上述研究組織所領導或規劃的研究分工進行研究者之間的合作），一方面陸續引介或翻譯西方南亞研究的重要理論與成果，二方面設定小型研究專題（例如：嘗試整合不同區域研究的成果，進行區際比較工作，藉以深入探究南亞與鄰近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該區域對於整個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希望由「點」而「面」，逐步建構一個屬於台灣的南亞研究視野；在未來，則希望進一步綜整前述研究成果，從理論層次向既有西方南亞研究典範與框架提出對話，並透過專業研究機構或單位的建置，讓台灣能持續為全球南亞研究社群作出重要貢獻。

\* \* \*

(收件：96年7月9日，接受：96年11月1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 Area Studie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 South Asia: The Evolution and Challenges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n American Academy

*Shih-tse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Science Institute of Northern Taiwan

*Shih-chiang Cha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echnology and Science Institute of Northern Taiwan

## Abstract

The establishing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n America during the decades following the WWII marked an important shift in the study of South Asia from Oriental studies and Indology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area studies approach which tried to treat this area as objects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During the ensuing decade, the earnest scholarship begun with the leading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ll fostered new projects focused on South Asia. They had emphasized study of other cultures for broadly humanistic reasons; not tied to any governmental defini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 as was fashionable in the 1950s. They aimed not at producing useful expertise, but at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brief account of the political, intellectual, and institutional roots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academy. It then turns to both the critiques of South Asian studies

and the challenges and contributions they have brought to the disciplines and to global knowledge. By presenting the evolution and challenges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academy, this article is also an attempt to address the prospect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n Taiwan that might be useful for students, faculty, and administrators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discussions.

**Keywords:** Area Studies, Globalization, Indology, South Asian Studies

## 參考文獻

- 黃柏棋，宗教秩序與政治秩序：論印度思想及其與不同傳統之交涉（台北：明目，2005年）。
- Alley, Kelly D.,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y of India," *India Review*, Vol. 5, No. 1 (2006), pp. 122~143.
- Appadurai, Arjun,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in Arjun Appadurai, ed., *Globaliz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1.
- Ayres, Alyssa, "Disconnected Networks: Notes towar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Filling the South Asia Expert Gap," *India Review*, Vol. 2, No. 2 (2003), pp. 69~96.
- Ayres, Alyssa, "Beyond Disciplines: Indi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Review*, Vol. 5, No. 1 (2006), pp. 14~36.
- Bates, Robert H., "Area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Rupture and Possible Synthesis," *Africa Today*, Vol. 44, No. 2 (1997), pp. 123~131.
- Bates, Robert H.,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A Useful Controvers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97), pp. 166~169.
- Chomsky, Noam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 Clifford, James,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ohen, Benjamin B.,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in the US Academy," *India Review*, Vol. 5, No. 1 (2006), pp. 144~172.
- Cohn, Bernard,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Delhi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Conlon, Frank F., "History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Delhi: Manohar and AHS, 1998), pp. 283~305.
- Cooper, Frederick, "Conflict and Connections: Rethinking Colonial Af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9, No. 5 (1999), pp. 1516~1545.
- Crane, Robert, "Preface on Richard L. Park," in Paul Wallace, ed., *Region and Nation in India*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1985), p. 7.
- Davis, Richard, *South Asia at Chicago: A History* (Chicago: Committee on Southern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 Dharwadker, Vinay, "Orientalism and the Study of Indian Literatures," in Carol A. 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 eds.,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Press, 1993 ) , pp. 158~185.
- Dirks, Nicholas B., "Introduction: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in Nicholas B. Dirks, ed.,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 , pp. 1~24.
- Dirks, Nicholas B., *The Hollow Crown: Ethnohistory of an Indian Kingdom*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 .
- Dirks, Nicholas B., "South Asian Studies: Futures Past,"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rticle 9,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 ( 2003 )
- Dirlik, Arif,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Roxann Prazniak and Arif Dirlik, eds.,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 , pp. 15~51.
- Goldman, Robert P., "Sanskrit,"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 Delhi: Manohar and AIIS, 1998 ) , pp. 501~517.
- Guha, Ranajit,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 Harootunian, Harry and Naoki Sakai, "Japa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7, No. 2 ( 1999 ) , pp. 593~647.
- Heston, Alan, "Economics,"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 Delhi: Manohar and AIIS, 1998 ) , pp. 189~209.
- Hirst, P.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 .
-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 New York: Vintage, 1996 ) .
- Inden, R., *Imagining India* ( Oxford and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0 ) .
- Jackson, Peter A., "Space, Theory and Hegemony: The Dual Crises of Asian Area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18, No. 1 ( 2003 ) , pp. 42~88.
- Janes, Jackson, *Priming the Pump: The Making of Foreign Area Specialists* (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91 ) .
- Johnson, Chalmers, "Preconception Versus Observation, or the Contribu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0, No. 2 ( 1997 ) , pp. 170~174.
- Karp, Ivan, "Does Theory Travel? Area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Africa Today*, Vol. 44, No. 3 ( 1997 ) , pp. 281~295.
- Kennedy, Michael D., "Ideological Diversity and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in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Vol. 11, No. 2-3, <<http://www.umich.edu/~iinet/journal/vol11no2-3/kennedy.htm>> ( 2004 ) .

- Kopf, David, "Hermeneutics versus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89, No. 3 (1980), pp. 495~506.
- Ludden, David, "Area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Vol. 6, No. 1 (2000), <[http://www.frontiersjournal.com/issues/vol6/vol6-01\\_Ludden.htm](http://www.frontiersjournal.com/issues/vol6/vol6-01_Ludden.htm)>
- Ludden, David, ed., *Reading Subaltern Studies: Critical Histories, Contested Meaning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outh Asia*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Publishers, 2001).
- Ludden, David, "Why Area Studies," in Ali Mirsepassi, Amrita Basu and Frederick Weaver, eds., *Localiz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1~137.
- Marriott, M., "Constructing an Indian Ethnosociology,"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Vol. 23, No. 1 (1989), pp. 1~41.
- Marriott, M., "Constructing an Indian Ethnosociology," in M. Marriott, ed., *India through Hindu Categories* (New Delhi: Sage, 1990), pp. 1~39.
- Marriott, M. and R. Inden, "Toward an Ethnosociology of South Asian Caste Systems," in K. David, ed., *The New Wind: Changing Identities in South Asia* (The Hague: Mouton, 1977), pp. 227~238.
- McGetchin, Douglas T., Peter K. J. Park, and Damodar Sar Desai, eds., *Sanskrit and Orientalism: Indology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Germany, 1750-1958* (New Delhi: Manohar, 2004).
- Mitchell, Timothy,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cial Science,"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rticle 3,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3/>> (2003).
- Miyoshi, M. and H. Hartoo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atterson, Maureen L. P., "Institutional Base for the Study of South As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ol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Delhi: Manohar and AHS, 1998), pp. 17~107.
- Pieterse, Jan Nederveen and Bhikhu Parekh, "Shifting Imaginaries: Decolonization, Internal Decolonization, Postcoloniality," in Jan Nederveen Pieterse and Bhikhu Parekh, eds., *The Decolonization of Imagination: Culture, Knowledge and Power*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9.
- Prahlad, C. K.,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 (Upper Saddle River, NJ: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2005).
- Prakash, G., "Writing Post-Orientalist Histories of the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from Indian Historiograph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2, No. 2 (1990), pp. 383~408.



- Prewitt, Kenneth, "SSRC, ACLS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Area Studies," *LASA Forum*, Vol. 27, No. 1 (1996), pp. 10~12.
- Rhoades, Gary, "Capitalism, Academic Style and Shared Governance," *Academe*, Vol. 91, No. 3 (2005), pp. 38~42.
- Rocher, Rosane, "W. Norman Brown, 1892-197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96, No. 1 (1976), pp. 3~6.
-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 pp. 1~28.
-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inger, Milton, "David Mandelbaum and the Ris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A Reminiscence," in Paul Hockings, ed., *Dimensions of Social Life: Essays in Honor of David G. Mandelbaum* (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1987), pp. 1~9.
- Suzuki, Tessa Morris, "Anti-Area Studies," *Communal/Plural*, Vol. 8, No. 1 (2000), pp. 1~21.
- Szanton, David L.,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rticle 1,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 (2003)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South Asia at Chicago: Fifty Years of Scholarship," <<http://www.lib.uchicago.edu/e/su/southasia/50yrs1.html>> (n.d.)
- Trautmann, Thomas R.,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Tuathail, Gearoid O., Andrew Herod and Susan M. Roberts, "Negotiating Unruly Problematics," in Gearoid O. Tuathail, Andrew Herod and Susan M. Roberts, eds., *An Unruly World?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Ge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24.
- Wadley, Susan S., "Anthropology," in Joseph W. Elder, Edward Dimock and Ainslee T. Embree, eds., *India's Worlds and US Scholars* (Delhi: Manohar and AIIS, 1998), pp. 111~137.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 in Andre Shiffrin, ed.,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The New York Press, 1997), pp. 195~231.
- Wallerstein, Immanuel, ed.,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Washbrook, D., and R. O'Hanlon, "After Orientalism: Culture, Criticism, and Politics in the Third Worl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4, No. 1 (1992), pp. 141~167.